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階級與性別角色

有關性別角色的分化與性別認同的差異，從不同的觀點與理論視角出發，會有不同的看法及主張。一般而言，心理學上所偏重的性別角色研究，在於辨別男女差異的態度、動機、自我概念、期望水準，以及其他涉及人格特質等變項之探究；而社會學家的研究則傾向於著重在人際關係中，相互對應往來的角色，以及其社會化的歷程為何等問題。然而，不管如何，過往的研究在討論性別議題時，仍多著眼於「父權壓迫」此一論述，但從批判理論的觀點來看，「階級」亦是一項宰制的力量，不同階級因為有不同的生活形態與價值觀念，因此形塑出的階級文化也有很大的差異。故，以下先對性別角色作一定義，並從階級文化差異的觀點，來瞭解不同階級文化形塑的性別差異。

壹、性別角色的定義

性別角色（sex role）和性別（gender）意指文化概念中，何謂適宜的男性與女性行為、性別導向、生理性、以及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自我概念（Loy & Norland, 1981: 179）。在日常用語中，「性」與「性別」往往混雜使用，但是當我們在研究有關性別的議題時，研究者往往會做更細部的區分。一般來說，「性（sex）」是生物學上的語彙，一個人是男性或是女性，是因他們的性器官與基因而定；而「性別（gender）」則是心理學上與文化上的語彙，是個人對男性化與女性化的一種主觀感受（性別認同）；性別也可以說明社會對男性行為和女性行為的一種評價（性別角色）（林明寬、劉秀娟譯，1996）。事實上，生理性別雖然是人類天生下來就已決定，無法改變的；但是決定日後個人種種社會行為與互動表現的，卻是個人對所屬性別角色的認同。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於性別角色一詞做番瞭解。



所謂性別角色，Block（1973）認為是一群「特性」，是社會所界定、大眾所認可的一套行為模式，而這些特性可以幫助人們在他所處的社會中區分男女。Hilgard, Atkinson & Atkinson（1979）則提到，個人在社會化、性別化的過程中，所學習到與性別有關的行為、態度、偏好與人格特質，便是所謂的性別角色。不同的文化會根據性別，為其成員規劃行為藍本，即男性該具有哪些行為、女性該具有哪些行為的一些成文或不成文規定。因此，性別角色可以說是社會對男女性展現出之行為與態度的一種評價，且性別角色上的差異不是來自於生物學上的差異，而是人為所建構的，經由歷史、文化與心理歷程共同塑造而成。事實上，每一種文化都會對男性與女性這兩個名詞加以創造出屬於該文化的意義，這樣的意義包含著對每一類性別應該如何表現（即性別角色）的一連串期待（林明寬、劉秀娟譯，1996）。因此，歷來學者對於性別角色的定義，基本上不外乎兩方面的詮釋：首先，它帶有濃厚的社會價值與意義在其中；也就是說，性別角色具有濃厚的社會規範，何謂合宜的角色表現，事實上是由社會所建構的規範而定。再者，它所規範的是身為一個社會人，其行為態度表現必須符合社會上所定義的男女角色。由此看來，性別角色的規範與運作係以社會所判定的價值觀為準，受到該社會文化價值觀的影響甚劇；它可以說是一種期待，或是理想化的男女行為標準。個人藉由自我表現出來的性別類型來確定自我的性別，並且在不同的社會角色和位置中，表現出男性或女性的特質；然後，持續地表現這些行為或特質，好讓自己能滿足於內在的自我一致性需求，並且符合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根據Basow（1992）、Rhoda Unger（1989）等人的研究資料顯示，男女兩性在行為及性格上的差異，大都是由於社會因素所造成的，例如社會化、社會酬賞、個人出生背景因素及他人的期待等。由此可知，「性別」是由人（社會）所建構的，一個人所體現出來所謂「合宜」的性別表現，並非絕對出自於單純生理性的反應，而是與其所身處的社會文化脈絡息息相關（引自張資寧，2000）。



貳、階級對性別角色的影響

不同階級因為有不同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意識型態，因而產生出不同的階級文化。倘若以社會學家 Max Weber 「理念類型」(ideal type) 的概念來分析所謂的階級文化，我們可以解釋有一連串的價值、信念、生活取向(orientations to life) 和習俗被稱為是勞工階級文化；相對地，也有一連串與勞工階級相異的價值、信念、生活取向和習俗被界定為「中產或上層階級文化」(黃淑君，2000)。階級文化影響下的差異，在生活中的諸多層面發酵，例如：Bernstein 認為不同階級所使用的語言律則並不相同，由於工作性質的差異，使得勞工階級與中上階級產生不同的工作語言，進一步影響到下一代的口語表達模式，導致不同的語言形式形成了不同的階級文化(引自 Gaine, 1999: 34)。而在生活取向方面，勞工階級因為薪資所得有限，對工作也沒有很大的熱情與滿足感，因此缺乏遠程的概念和計畫，不喜歡計畫未來，重視當下的快樂；相反地，中上階級的工作穩定又高薪，從工作當中也可獲得升遷機會與自我實現感，因此他們會想規劃未來，藉著延遲滿足以追求日後更好的生活。由此可知，不同階級的確有不同的階級文化，階級文化的差異會影響到他們生活中的各個層面，不管是待人處事、行為模式或思想信念等等，這當中當然包含著性別角色的建構與看法。由於階級文化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性別社會化歷程，因而使得勞工階級文化與中上階級文化對於相同的性別有不同的定義。在 Weitzman (1979) 以及 Serbin、Powlishta 與 Gulko (1993) 的研究中就指出：社經背景較高的兒童，對於性別特質的定義較為彈性寬鬆；相反地，對兩性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性對待，或者有「表意性」與「工具性」性別特質的二元區分者，通常來自於勞工階級。換句話說，男孩與女孩很可能會有各自對於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解讀與詮釋，而這會隨著所屬社會階級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正因為不同階級對於性別角色規範有彈性上的差異，才進而產生不同的性別互動與性別關係。

以下將針對不同階級的性別角色觀以及性別互動進行探討，並透過實質的互動模式與對男女特質的意義界定，來瞭解不同階級所締造的性別關係。個體所抱持的性別角色觀念，因為不同階級文化的影響而有不同的界定，本研究將



其內涵再粗略的區分為「性別特質的劃分」、「性別角色的分工」，以及「性別界線的跨越」三個層面。性別特質的劃分意指，有哪些行為特質被劃歸為隸屬於男性，又有哪些被劃歸為隸屬於女性，而這樣的特質劃分是否是截然區隔的；其次，性別角色的分工係指，是否保持著傳統的兩性角色分工模式、「男主外、女主內」的信念強烈；最後，性別界線的跨越是指，個體對於性別角色觀念的開放及彈性程度，是否能包容有別於傳統世俗價值觀的性別角色表現。而態度或觀念是個人內在的一種心理歷程，除非透過行為加以呈現，否則較難為他人所察覺。因此，在探討完觀念上的差異後，將更進一步討論不同階級在外顯行為表現上的殊異，最明顯，也是相關研究較多的即是學生與同儕間的互動方式，包含著言語的交鋒與肢體的互動兩個部分，並藉此瞭解青少年依此建構出來的性別關係呈現何種樣貌。

一、性別角色觀

（一）性別特質的劃分

對於何謂「性別合宜」或「性別偏差」，不同階級會有不同的標準與界定。這些標準與詮釋，會影響他們的行為表現以及對他人的看法，也使得有關男子氣概與女性特質被賦予的價值結構有所差異。對於勞工階級來說，男性與女性的特質是截然二分的，男生就該有男生的樣，女生就該有女生的樣，也因此在此無形之中，複製了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在 Anyon (1983) 的研究觀察中，發現許多勞工階級女孩表現出符合女性刻板印象的行為舉止。她們相當在乎女性化特質的展現；打扮時髦亮麗、且極度女性化，表現出來的樣態完全就是大眾媒體所塑造出來的女性形象翻版；她們對於同性的看法與評價不在於專業的有無，一個女性是否值得她們羨慕與效法，完全取決於其外表是否吸引他人(Anyon, 1983: 41)。而從勞工階級男性的觀點來看，女人要像「小綿羊」一樣，柔弱中帶著一股傻氣，永遠都要像個天真的少女一樣；既要具備「性吸引力」，但又不能有太過豐富的「性經驗」。好女孩的標準是「文靜」、「順從」、「能被支配」、「身材要好」、「臉蛋要好」。女生若能表現出缺乏對男性支配的抵禦能力，則能確保她被男生視為「好女孩」。相對於女性的被動與柔弱，男人則應該是性的主動者，



有強健的體格、勇猛的戰鬥力（Willis, 1977: 44-45）。Clarricoates（1980）針對不同階級背景學校的研究中，亦發現到許多牽涉到性別價值結構的殊異性：例如在勞工階級的學校中，何種表現才是「典型」的男生，何種表現才是「典型」的女生，有很明確的定義與規範；對於男子氣概的詮釋侷限在「強壯」、「勇敢」、「堅強」、「果決」之上，對於女性特質的詮釋則崇尚「文靜」、「有氣質」、「被動」，呈現出兩極化的現象。田俊龍（1998）的研究也顯示出，勞工階級小學生對於女性特質的期待就是：「要溫柔」、「像從前的女人一樣懂得三從四德，我說什麼她就做什麼」。不僅男生如此認為，女生自己也覺得身為女性應該要具備性吸引力、要溫柔、注意穿著打扮、以男朋友為重心（Willis, 1977; McRobbie, 1991）。

然而，個體在性別角色發展的過程中，並不一定會全盤接受社會所賦予的價值和期待，很多時候會面臨角色的衝突而產生反抗行為。對於勞工階級的女性來說，即使意識到階級文化對於其女性特質的規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壓迫；但是，她們所採取的抗拒方式仍然在不知不覺當中又落入了傳統的女性刻板印象。她們有時候會以誇大的女性特質來反抗老師的規定，如：對男老師撒嬌、諂媚使老師少出一點功課；甚至利用她們剛發育的身體，穿著性感服裝、擦指甲油、塗口紅來表現女性特徵，以引起班上男孩子與男老師的注意，其目的就在於反抗學校所傳遞的「女性應被動」的意識型態（Anyon, 1983: 19-20）。McRobbie（1991）也發現有些勞工階級中學女孩，會過分展現自己的女性特質來吸引男同學與老師的注意，以抗拒學校的規範，如：濃妝豔抹、穿著性感、交男朋友，來挑戰、嘲笑老師所喜愛的傳統女性清純、柔弱、勤勞、被動的特質。

相較於此，中上階級的女性較不會以女性化的外表來做為引人注目的手段，許多女性以較為男性化的打扮為主，以易於活動的穿著為考量。此外，有別於勞動階級女孩表現出來的「文靜」、「害羞」、「被動」，中上階級的女孩不會吝於展現自己的企圖心與積極性。她們不以外表贏得注意，反而藉著與男性一同參與活動，展現對於學業成就的追求，並以不遜於男性的優異表現，贏得同儕的目光。中上階級男性面對女性同儕優異的表現，以及跨越傳統性別角色限



制的種種舉動，並不會加以排斥，反而能以尊重欣賞的態度看待。也由於在中上階級的環境中，較能以尊重的態度讓女性平等的參與活動，因此女性不需要靠「女人味」的展現來贏得注意，她們被鼓勵表現出活躍性。她們以積極的態度參與課堂上的討論與計畫，也參與學校的社團、音樂會與比賽等等，樂於展現其能力與才華（Anyon, 1983: 42）。再者，中上階級的小孩一般而言口語溝通的技巧較好，因此，中上階級的女性不需要靠一些傳統女性特質來博得注意或是作為競爭的籌碼，她們往往靠著溝通、講理，甚至是和對方辯論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或達成目標。

（二）性別角色的分工

在勞工階級的性別分工上，也可看出較為僵化、刻板的分工模式。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社會上傳統賦予女性的角色就是為未來身為妻子與母親的角色做準備，女性被期望提供情感性的支持與養護的功能，並擔負起重複性與例行的家務工作。隨著時代的進步，情況或許有了一些改變，但是對於勞工階級的女性來說，這些價值沒有太大的轉變。事實上，這些女孩從很早就開始為了未來的生活預作準備，準備擔負起未來操持家務、生兒育女的責任；然而，在同時，勞工階級的男孩子卻被期望要能成為家庭的支柱，並成為家計的負擔者，他們對於未來的準備與女孩子截然不同（Eder & Parker, 1987）。總之，在勞工階級的文化裡有很強烈的性別刻板化現象，嚴格地奉行著傳統的性別教條，認為養家活口是男性的責任，女性的責任就是要擔負起好妻子與好媽媽的角色。Kessler 等人（1985）在 1977-1988 年間，研究澳洲中學 100 個 14、15 歲來自勞工階級和上層階級的中學生，發現勞工階級女孩以交到一個男朋友來取得同儕地位，她們的志向以結婚和生小孩為主，而勞工階級的男孩也多認為女生就應該待在家裡帶小孩（Kessler et al., 1985: 37-38）。Connell（1995）的研究也顯示出，勞工階級的男學生從小就覺得將來結婚後，妻子應該專心在家裡帶小孩，而他出去工作，因為他們認為女性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比較適合去做家務和帶小孩的事情。不只是勞工階級的男生在觀念上認為如此，許多勞工階級的女生也



認為男生應該負起養家活口的責任（Weiler, 1988）。

但是對於中上階級的女性來說，由於階級環境的有利因素，使她們有著追求學業與事業的企圖心與自信心。未來對於她們來說有著無限的可能，她們不像勞工階級的女性一般受制於婚姻，認為女性一生的幸福需要仰賴於男性。Proweller（1998）研究上層階級私校女學生的性別符碼時發現，對於這些上層階級的女學生而言，身為一個女性，女性化和高學業成就之間並不會產生矛盾。學業成就表現良好讓她們獲得充分的自信心，並強化她們的自我概念，也因為她們知書達禮有富有教養，所以其他男學生才會覺得她們是「名門閨秀」。當然，她們並非完全摒棄「性感」，性感對於她們來說仍然是能吸引男性的重要女性特質之一，但是一方面，性感並非唯一要件；再者，性感也非侷限在所謂的「性吸引力」之上，不是著眼於穿著打扮暴露性感，或是舉手投足間的賣弄風情，而是從自己的成就表現上來獲得異性的注意。也因此，結婚生子非中上階級女性人生中的唯一選項，和男生的親密行為並不特別吸引她們，學業成就的追求與事業上的良好表現才是她們的目標。她們即使意識到，對於事業的企圖心可能會影響日後的婚姻或家庭生活，但想放棄婚姻的渴望而追求事業的卻也大有人在（Proweller, 1998）。面對女性這樣的表現，中上階級的男性多顯現出接受、包容，甚至是欣賞、肯定的態度。這些能力強的女生並不被認為是「不像女生」，從他們的觀點來看，只能說是個人特質不同，個性不同罷了。面對「女強男弱」的情況時，他們也會以自我解嘲的方式幽自己一默。因為他們普遍認為，要求女性溫柔體貼、弱不禁風的時代早已過去，男生不一定要比女生強，其實兩性是彼此互依互賴，互補不足的。

（三）性別界線的跨越

在勞工階級文化裡，性別界線的劃分是相當明確且不容跨越的，因此女生太過凶悍以及男生娘娘腔，都被視為是一種性別偏差。勞工階級男性對於在身體和性方面無法控制的女性，以及脾氣較大、較凶悍、較愛現的女生，都予以痛斥、貶低（Wood, 1984: 59-65）。在學校中過度對學業成就的追求也被認為是



女性化的行徑，功課好的男生被認為是娘娘腔的表現，性別特質的截然劃分是男女雙方所共同奉行不悖的。勞工階級男女生對於「娘娘腔」的男生皆會予以「排擠」、「侮辱」、「嘲笑」，並認為「娘娘腔」是不正常的性別行為（Clarricoates, 1980: 26-30）。在國內，黃淑君針對勞工階級國中學生所做的研究亦顯示出，勞工階級男生對於所謂「娘娘腔」的男性同儕，不但相當不能接受，還覺得噁心；女生也表示，將來選擇的對象絕對不會是娘娘腔的男生（黃淑君，2000：75）。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勞工生活裡，經常可以發現強調勇猛的文化，認為「順從的男人」是軟弱的（Connell, 1982: 98）。因此，在勞工階級的學校中，若女生表現出較具攻擊力或是獨立性的一面，而男孩表現的較女性化或是敏感的，都會被認為是一種不正常，一種偏差。

而中上階級女性卻以表現出「男孩子氣」，來展現出反抗行為。她們藉由表現出如同男孩子一般，來作為另一種抗拒刻板印象的方式。藉著較為男性化的衣著或肢體行為的展現，來避開刻板印象上認為女性應該從事的所謂「安靜」、「室內」的活動，她們很多展現出對於戶外活動的喜愛，並具有充沛的活力，而男生對於這些充滿活動力與攻擊力的女生，也並不排斥，甚至充滿讚許（Anyon, 1983: 32-42）。由於上層階級學校比勞工階級學校要更強調對學生自主能力的訓練，加上個人主義取向的階級文化背景薰陶之下，使他們不見得會去遵守傳統的性別角色觀，他們對於性別角色的界定也要彈性許多（Connell, 1977）。Clarricoates（1980）的研究就發現，中上階級男女學生彼此的界線不像勞工階級學校那麼大，所謂娘娘腔的男孩子在中上階級學校中是能被接受的，甚至他們的人緣還相當好，因為他們的許多特質讓男生女生都樂於與他們交朋友。

二、互動模式與性別關係

Thorne（1993）認為從觀察學生在學校的遊戲活動中，可以去發掘他們在生活世界中所建構出來的權力關係。事實上，人與人之間很多的互動、對話裡都隱含著權力關係，而透過對於性別符碼的詮釋以及瞭解不同性別間的互動，可以進一步去檢視不同性別之間，地位的高下之分與從屬關係。



(一) 言語及肢體互動

勞工階級的男生喜歡以評論女生的身材為樂，除了嘲笑女生的身材並取外號，像是「航空母艦」、「阿姆斯特壯」等等之外，在男女互動的過程中，還會用一些帶著「性意味」的字眼來諷刺、取笑，甚至是羞辱女生，像是賤、蕩婦、婊子等等（田俊龍，1998）。Wood（1984）研究一所勞工階級背景的男女合校，發現該校男生談論的話題幾乎都圍繞在女體之上，不論是女生的動作或是身材，都是他們取笑的話題，物化女性與評價女性成了勞工階級男子氣概構成的重要行為，藉此把女性貶抑為附屬的地位，作為提高男性、父權的媒介與手段。其實，勞工階級的男孩不僅喜歡以帶「性暗示」或「性意味」的話語羞辱女性，同性之間彼此的互動中，也常常透過這種「彼此羞辱（insult exchanges）」或是「性取笑（sexual teasing）」的方式，來表現出男子氣概（Willis, 1977）。此外，在言談中也可以發現以男性為主導、女性為附庸的談話模式。在男女生混合的談話中，常常可以發現男生是話題的帶頭與建議者，女孩的意見則是點綴式的插入其中，女性若太過於主導話題，常常會被斥責為「女人家懂什麼」（Willis, 1977）。Clarricoates（1981）在他的研究中也發現，當他同時訪問男孩與女孩時，男生不但很容易插話、主導談話的進行，也很容易對女性的意見嗤之以鼻。

而在肢體互動方面，觀察勞工階級小孩在遊戲中的互動方式，可以看出「男支配、女附屬」的性別關係。在遊戲的過程中總是由男性扮演進攻、挑戰的主動角色，而女性則扮演防守、抵抗的被動角色（Clarricoates, 1980）。而在打鬧追逐的過程中，男性又常常將帶有性意味的騷擾與暴力行為帶入遊戲之中，當中的侵犯意味相當強烈。勞工階級男生的身體攻擊行為之所以多被接受，是因為老師認為這來自於家庭，因此視之為理所當然（Clarricoates, 1980: 30）。觀察勞工階級學生的校園活動，會發現男生侵犯女生的頻率遠多過於女生去侵犯男生，而且女生之所以會主動去追逐男生，往往是因為男生先去惹她們所致，但男生通常認為這只是在逗女生玩玩而已（楊清芬，1995）。勞工階級男生的校園攻擊行為之所以如此普遍，不只是因為可以藉此表現出男子漢的氣概，還有一項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根本不認為攻擊女生是一項錯誤的行為。



不管是肢體上的互動（如遊戲行爲），或是言語上的交談，面對男性這樣的挑戰，勞工階級女生通常只能做被動的防護，而不能有積極的抵抗。她們將這一類的行爲視爲理所當然，並默默承受，反正抵抗也是「徒勞無功」。更甚者，那些積極反抗的女性，只會被視爲難以「馴服」、難以「駕馭」，由於未能表現出傳統的女性化行爲，而更爲男性攻擊與排斥（黃淑君，2000）。因爲只要勞工階級女性表現出過於積極或是主導的態度，不符合勞工階級文化所要求的那種退縮、被動的女性角色，就會受到男性毫不留情的批評與恥笑。若從 Bernstein 的語言律則來解釋，因爲勞工階級的語言表達與字彙運用較爲貧乏，也因此影響了勞工階級女性在面對男性的辱罵與嘲笑下，缺乏回應與挑戰的能力（引自陸洛，1997）。而且，若女性以同樣的模式加以反擊，通常不但會遭受男性更嚴厲的回應，連同性同儕也會加以排斥。女性身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只能採取逆來順受的方式來避免男性進一步的攻擊，並維繫與男性之間的友誼。在 Eder 等人（1995）的研究中也發現，勞工階級的女生在面對男生的欺負時，通常都是忽略或默默忍受，幾乎很少發生激烈回應的行爲。除非男生太過份時，女生才會出現女性儀式化的反應，如尖叫、怒視、瞪眼、大聲責備等等。總之，在勞工階級的環境裡，女性要溫順、被動、不要太有主見才是男性的「良伴」，才有機會與男性建立友伴關係。太過「愛生氣」的女生是無法加入男生的遊戲中的，亦無法受到男性的歡迎。只有能接受、容忍、順應男性這種暴力行爲的女生，才有機會和男生打成一片（黃淑君，2000）。而且這些女生往往將男生對女生的肢體侵犯合理化爲「玩耍」，甚至她們還以能和男生玩在一起爲榮，認爲那些愛生氣的女生會「嫉妒」她們，這當中屈就與討好的心態一覽無遺。

國內外有關中上階級青少年在性別互動方面的研究較爲缺乏，由於國外中上階級所就讀的學校多爲私校，而國外私校往往是男女分校的，故在研究上有其困難性（McConnell, 1997，引自黃淑君，2000）。而在國內，一方面是在國中小階段通常基於學區制，還是以混合編班爲主，因此學生來源較不一致；再者，或許因爲中上階級背景的家長往往本身擁有高學歷，並較爲積極參與且關心學校事務，對研究而言是一群頗有挑戰性的母群，因此學校或老師爲了避免困擾或麻煩，往往加以婉拒。然而在有限的文獻中，我們仍可發現到一些訊息。



中上階級的男生雖然可能也認同男強女弱的觀念，但是有別於勞工階級男性展現出攻擊力、輕蔑女性的行徑以示身為男生的「男子氣概」，中上階級男性認為有教養、有禮貌、能尊重女性、能展現出紳士風度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Pyke, 1996)。縱使在中上階級的男子氣概中也強調男性的支配權，但是他們強調的不是體力上的支配力，而是在領導能力與專業知識上的支配，做為他們建構男子氣概的來源(Connell, 1996)。這樣尊重女性的態度，也使他們儘管依然會在背後談論女生的身材，但是卻不會公開以此來加以取笑；也不太會以身材、長相來對女生取綽號。而觀察中上階級男女學生之間的互動模式可以發現，男女生關係較為緊密，常常彼此互助合作、除了討論功課學業之外，也會一起商量一些個人私事或講一些內心話，課餘時間也常相偕出遊(黃淑君，2000)。

中上階級男女在性別互動上，受到他們所秉持的價值觀念影響，並不會認為女生天生一定比男生弱，或是一定要表現的比男生弱。因為在他們的生活經驗裡，女性一直是他們很好的搭檔；在兩性相處的過程中，女性不管是在領導統御能力或是運動技能上，都與男生並駕齊驅，甚至更勝一籌。不但女生本身對於加諸在自己身上的傳統性別枷鎖予以揚棄，認為婚姻與事業並不相互衝突，甚至對於事業的想望更甚於婚姻；就連男生本身也接受這樣的觀念，並對於女生的獨立自主相當肯定。在黃淑君(2000)的研究中發現，中上階級的女學生並不畏於表現出主動、活躍，甚至具攻擊力的一面，而她們在學校中的種種表現也一點都不遜於男生。這是因為上層階級不論男女都被鼓勵要表現出活躍，且她們的口語表達能力也比勞工階級要好上許多。由於女性已經越趨中性化，所以男生女生並無太大的不同，彼此相處起來相當自然；甚至對男生來說，與這些女生相處反而更為自在與輕鬆。在勞工階級學校中那種男追女、男打女的情形，呈現在中上階級學校中反而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主被動關係，男生反而比較是受「欺凌」的角色。這並非代表男生無力反擊，而是從小的教育教導他們男生應該保持風度、紳士、尊重女性的行為。相對的，同學中若有人與異性的互動模式是採取像勞工階級一般的形式時，反而會被笑為幼稚，而不被認同。



(二) 性別關係

在上述的性別角色觀與性別互動模式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勞工階級文化下的性別關係是較為僵化、二分與難以跨越的。在明確界定男性應該如何，女性應該如何的這種性別角色涇渭分明的規範情況下，很容易形成男女雙方的對立，男女雙方也比較無法有良性的互動（Anyon, 1983; Willis, 1977）。而在男女的互動方式中，我們也可看出「支配—隸屬的兩性關係」：女性處於被動的角色，男性被期待成為性的主動者，一直是主動發揮攻擊的一方；而面對男性的攻擊，女性卻只能秉持傳統的性別角色，成為被動者。就在這種男追女跑、互相辱罵的過程中，擴大成為男生與女生的戰爭。男生評論女生的身材，女生卻無權去評論男生。女性面對男性的騷擾與侵犯，即使覺得不舒服或不高興，但也無可奈何，只能選擇默默承受，太過認真看待的女生反而會被認為小心眼（田俊龍，1998；黃淑君，2000；楊清芬，1995）。因為對於勞工階級來說，男生對女生的侵犯是一種男子氣概的展現，這也是他們自幼所能理解的與異性建立關係的模式。而勞工階級男生總是針對女性身材、外貌的羞辱，也讓勞工階級女性以自己的外貌身材為首要關心，不斷再製父權的支配行為。當進入異性戀之後，女性會開始順應父權社會中所建構出的女性特質，例如使用化妝品、以討論男朋友為話題的中心、展現出女性化的一面等等。保守的性別角色觀，也讓「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更加鞏固，且難以挑戰。

而從中上階級學生的互動中，我們比較可以看到男女混雜的遊戲形式，而這樣不分性別的男女互動，並不是建立在男支配、女附屬，或是男強女弱這種過於對立、二分的型態下。相反地，中上階級男女生的界線並不會特別明顯，性別分離的情況較不嚴重，一方面女生較不受傳統性別角色的約束，而男生也會與女生一起進行較為女性化的活動，呈現出來的性別關係是較為彈性多元的。再者，他們的互動模式是建立在較為對等的關係之上，彼此之間並不會用刻板化的性別角色來限制彼此（黃淑君，2000；Anyon, 1983; Clarricoates, 1980）。



第二節 階級、生產與性別角色

在研究中，當我們將「階級」因素納入討論時，會面臨如何定義「階級」的問題。不同的階級理論從不同角度去強調構成階級的要素：有些強調以生產工具的控制、生產過程和生產結果的區分做為劃分階級的要件；有些則從擁有商品的福利與服務的角度來劃分階級；當然尚有從是否能擁有資源，並進一步加以控制，使之成為政治權力與資源；或者從是否掌握教育與知識等等的角度作為出發，來進行階級的劃分（Dahlstrom, 1980）。不管採取何種界定方式，身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相較於其他形塑階級的要件，仍是處於相對重要的地位，勞力的分化也與階級的分化息息相關。也就是說，由於不同階級中，生產關係或生產習性的不同，造成了階級文化上的差異。事實上，生產活動可以視為構築整個階級結構的基礎所在，掌握了生產工具就如同掌握了控制人民的工具、握有另類的武器一般，透過所有權的擁有、獲利的掌握、資本的累積等等，創造了一個極化且分歧的社會結構（Dahlstrom, 1980）。人類的日常生活有很大一部份奠基於經濟勞動上，個人在日常生活上所表現出來的特色與其在生產社會關係上的位置密切相關。在生產場域中，人類主體除了是資本關係中生產條件的一環外，主體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從中獲得洞察，並不斷地去挑戰那些生產關係。事實上，勞工階級文化的力量有很大一部份即來自於生產場域之中，並藉由生產關係形塑出整體的階級文化。因此，「生產」並非僅僅只是社會整體產能的一個發動機而已，它還會以其特有的方式去影響社會的其他層面；而生產，以及伴隨而來的生產關係，則是社會與文化的根基，也是其外衣（Willis, 1980）。

就如同所有的身分認同一樣，性別角色也在日常生活的社會互動中，不論是在工作場域或其他地方，透過「認同」與「別異」兩者並行的過程，持續地被建構、交涉、與再建構（Collinson & Hearn, 1996）。Heward 指出，我們可以在「工作與權力」的脈絡下瞭解關於男孩對於父親的認同。事實上，不論是 Willis 或是 Tolson 的研究，也都是透過父親在勞動市場的地位，連結所屬的階級文化，作為其建構男性化特質的重要區分，並以此來建立他們對於勞工階級小夥子的



理論。Tolson (1977) 在建構男子氣概及類似概念時，最先關注並去分析的是社會與歷史脈絡的重要性。他認為，工作以及父親在勞力市場的地位，是建構男性化特質上的一個重要的區別指標。事實上，男子氣概的展現並非一成不變，受到權力關係（特別是如支配、從屬這一類交互關係形式）的影響，而展現出不同形式的男子氣概。意即，男子氣概的定義與體現並非一成不變且僵化的，而是會隨著權力關係有所轉變；分析男子氣概時不僅存在著多重性與歧異性，也會受到不同的工作形式與場域的影響。Kohn (1977) 及許多學者都曾指出，社會階級培養並影響一個人的價值觀，而這樣的價值觀反過來，又影響了我們與配偶、孩子和朋友之間的日常互動。因此，青少年在家庭生活中的種種經驗，受到雙親深刻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又會因為個體身處在勞動市場中不同的地位與文化，而有所變化。男性或女性化特質的展現與詮釋會隨著階級而有所差異，並非固定不變；而不同階級亦會有不同形式的性別角色社會化 (Deem, 1980)。亦即，對於何謂合宜的男性或女性行為這樣的意識型態，事實上存在有微妙的階級差異 (Anyon, 1983)。以下即試著從勞力生產的角度切入，探討職場中的生產型態與生產關係對於階級文化的影響，並進而與性別身分認同做一連結。

壹、勞工階級

一、工作性質

雖然對於不同階級文化間的探討，不僅僅只有從「工作」的觀點加以分析，但是由於每個人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比例甚高，並往往藉由工作上的種種活動來建立起對自己的認同感；也透過與他人在工作上的互動關係，加深對自我的認識。因此，從文化的觀點與角度切入時，對於「工作」最起碼的分析絕對佔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Willis, 1980)。不同階級在生產場域中，因為擁有資源多寡的差異，以及所處「位置 (situation)」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生產關係。

對於勞工階級的男性來說，由於社會上所服膺的是中上階級的那一套價值



觀，因此對他們來說，不論是過去在校園中的求學過程，或是進到職場之後的工作經驗，都是充滿著挫折與被壓迫。在學校當中，他們無法獲得學業上的肯定，因為學校鼓勵、甚至培養勞動階級順應、服從、因襲的文化態度，而這樣的文化與學校中的教育壓迫有著共謀關係。至於工作對於勞工階級的男性來說，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無趣、單調、重複性高、不用大腦且無意義，以致於他們很難從工作中獲得快樂。因此，對於這些勞工階級工作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從工作中消磨時間；工作對他們來說不是出於興趣，而是一種勞力的付出。由於對於工作沒有真正的興趣與認同，他們全副的精力就只關注在如何「殺時間」上（Willis, 1980）。雖然社會上所定義何謂「成功」的男性特質，是屬於中上階級的那一種形象；勞工階級在這樣的價值觀下，無法從中獲得成就感，但他們並非完全被動的默認、屈服於此之下。他們當中的部分洞悉了學校、社會上的壓迫，因此採取屬於自己的一套反抗模式。他們一方面藉由對勞動力的頌揚，來加以否定勞心者與女性的價值；另一方面則將勞動力與粗暴形式的男子氣概作一連結，形成相對於中上階級價值觀的對立模式，以獲得對自我以及所屬群體的認同（Connell, 1995）。

二、對勞動力的頌揚

Willis 曾言，看似平常但實則意義深厚的工廠文化的具體實踐要項之一，即在於勞動力與絕對男性性別定義之間的連結（Willis, 1980）。所謂真正的男人就是要從事付出勞力、汗水的工作，如此有別於鎮日坐在冷氣房中的中上階級管理人員，才能顯現出他們的男子氣概。Collinson 曾做過一個研究，將研究焦點集中在檢視「階級」與「性別」交織下，男性勞力工作者的價值觀。研究發現，勞工階級男性往往透過對於「勞心」工作者與「女性」的否定，來展現他們認同男子氣概的這種次文化（Collinson, 1996）。對他們來說，付出體力、勞力，才是真實的，那些上層管理人員在他們看來過於女性化，只會躲在辦公室當中，對於實際的生產過程卻一無所知；至於那些中產階級的辦公人員，則被視為是沒有實質生產能力的文字工作者；至於女性在他們眼中，更是容易被操縱、受



剝削的弱勢者。而在如此絕對男性化取向的背後，尚帶有一種與「工作（task）」相抗衡的意味存在。勞工階級男性不但認為中上階級男性的工作性質過於「女性化」，也對於其工作模式不甚苟同。傳統上，崇尚男性化的工廠地板文化價值強調的是工人的「獨立」與「真實」；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甚至拒絕「進步」，因為這意味著他們需要去作改變、並且成爲一個唯唯諾諾又順從的人，這種種都會威脅到他們的男子氣概。他們認為從事辦公室的工作是一種對自由的剝奪，且威脅到性別的認同。如同 Collinson 所訪談的一位工人所述：你不可能在辦公室開玩笑並大吼大叫，而且那裡到處都是討厭鬼與女性化的男人。再者，工廠的工人也不屑於那些上層管理者總是把工作帶回家，不分假日與晚上老是牽掛著工作。對於這些勞工階級的男性來說，他們極力建立一道在工作與私人生活之間，無法穿越的界線，時間到了就要收工回家，工作不能影響到其下班後的社交生活（Collinson, 1996）。

勞動力與性別定義，甚至是家庭生活的形式，有某種關連性存在。勞動力與工廠文化中某些男性特質的性別身份認同，亦有某些連結的關係，也是次級社會組織中相當重要且基本的特徵之一，但這些特質往往難以被辨認出來（Willis, 1980）。事實上，勞工階級的男子氣概往往在工廠文化中的勞動生產技術、經驗與關係上加以體現。對於勞工階級來說，勞動力行爲常常與性別認同彼此交錯糾纏：勞動力與優越的男子氣概相結合；而勞心工作則與次等的女性特質相結合。在 Connell（1991）的實徵研究中發現：勞工階級小夥子的附屬地位，會導致他們產生一種對「合法男性特質」的抗拒與反對，這些小夥子會去挑戰社會上所建構的那一套所謂合法、正統的男性特質，如理性的行爲、高度成就取向，以及對於社會的順從等等。由於這些小夥子自我意識的建構是來自於街頭，而非校園之中；因此，他們所發展出的是一套與社會規範所謂有禮、得體等行爲特質相對立的行爲；他們認為勇於冒險、接受挑戰者，才是真正的男人。在 Willis 的研究中亦發現，勞工階級小夥子的身份認同與勞心／勞力的分工密切相關，而這又與資本主義經濟息息相關。具體而言，勞動力與我們所謂的「優越的男子氣概」緊密呼應。書中有關勞工階級小夥子次文化的描述中說到，「男子氣概」的強調可以說是這群小夥子的重要特徵之一，不管是在學校或



是在工作場域皆是如此。對於這些小夥子來說，勞力技術與行為被視為，甚至普遍被接受是高度男性化的表現。

三、粗暴形式的男子氣概

在非正式的工廠文化中，勞力工人間的互動模式充滿著歧視、性意味、侮辱性的言辭與舉動；他們的幽默夾雜著侮辱、戲謔、且帶有貶低的意味。新進的成員往往要不斷地被取笑，藉由這種方式來試探這些菜鳥是否是「真正的男人」；若能處之泰然、適應良好，那麼就能順利的加入這樣的男性次文化中；反之，則無法被接納，甚至很有可能被排擠（Collinson, 1996）。而之所以會如此，就是一種維繫自尊的表現。勞工階級的男性之所以在職場上如此崇尚男子氣概的特質，一方面是因為對於勞工階級的男性來說，要在充滿敵意、壓迫的工作場域中求生存，就必須要去強調一種純粹的「勇敢」，不管是心理上或是生理上都是如此。對他們來說，維繫自尊的要件之一就是要從事艱辛的工作，這也讓他們能有回到家中繼續吹噓的條件（Willis, 1980）。再者，因為勞工階級的男性較少或甚至無法藉由工作獲得權力，他們較中產階級的男性更容易轉而去支配、控制家庭。面對在職場上的「無力」，甚至是「無能」，勞工階級的男性很容易採取一種粗暴的、富侵略性的、男性化的性別認同來藉以平衡他們在工作場域上所遭遇到的無力感（Edley & Wetherell, 1996）。這種勞工階級男性在支配階級的文化脈絡下所產生的掙扎，透過 Bourdieu 的文章獲得良好的詮釋。Bourdieu 認為：在支配階級的文化下，勞工階級男性很難從教育上獲得成就，並進一步獲得職業成就。而且對於這些勞動階級小夥子來說，要順應學校要求他們的那一套順從文化，對他們來說不啻是一種「去勢」。因此，他們頌揚的是與學校規範中那種馴服、順從、孜孜不倦的規範相抵觸、相違背的男性特質與男子氣概。藉由將這些學校所崇尚的特質貼上「似女孩子、缺乏男子氣概」的標籤，這些勞工階級小夥子更加強化好勇鬥狠、肢體性男子氣概特質的展現，並藉此更深化這種男性化的身份認同——一種源自於家庭、同儕團體的認同。且這樣的認同在大社會中，透過崇尚體力、肢體的勞動工作中獲得進一步的成就



(Arnot, 2004)。

對於勞工階級的男性來說，「有償工作 (waged work)」可以說是男子氣概的一種起碼的保證。因此，女性加入勞力市場對他們可以說是相當重大的威脅 (Mcdowell, 2003)。隨著時代的進步，面對越來越多女性開始加入勞力市場的壓力，勞工階級的男性由於過早輟學，學歷普遍缺乏與低落的情況下，讓他們飽受高失業率的危機，升遷的機會對勞工階級的男性來說，可以說是完全絕緣。在種種壓力下，勞工階級男性為了避免遭受社會的流動與去勢，因此藉由展現他們直接且強烈的男性特質來獲得地位的確認與保障 (Arnot, 2004)。也就是說，對於勞工階級的男性來說，採取支配階級的那一套言語與文化型式，不僅意味著對於所屬階級的不忠；也意味著對於男性特質 (剛強氣概、好勇鬥狠、自我主張) 的一種否定。甚至，接受中產階級文化 (不管是說話方式或是手勢、衣著等等)，也意味著一種叛逃。Bourdieu 並認為：勞工階級男性藉由在言談表達中，加入猥褻的、粗俗的用字遣詞，來展現他們崇尚男子氣概的性別取向，以及他們崇尚體力、勞動力的文化 (引自 Arnot, 2004)。但是事實上，不論是具暴力性的比喻、性別雙重標準、性力量與支配性形象的展現，都是這些勞工階級小夥子捍衛自己的最後一道防線 (Arnot, 2004)。因為工作場域並不是一個「去性別化 (degendered)」或是「中性」的環境，事實上它是一個性別化的過程，建構了勞動市場中男女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與性別認同。在以男性為主導，且為勞力取向的職業領域中，居於性別少數的女性的加入，不僅威脅到男人的工作，也讓他們的男子氣概受到挑戰。因此對於他們來說，這些特質是一種自我價值防衛機制，是一種避免被視為沒有能力而產生的一種保護機制，也是一種避免被認為是「女性化」、或是「不夠男人」的機制 (Jackson, 2002)。再加上低社經地位工作者的工作環境是高度階層化、具結構性的，也較為一成不變；必須對於要求與任務絕對的服從，因此其階級文化呈現出較為刻板、僵化的模式。故，如此的價值觀反映在兩性的互動中，所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個較具支配性、獨斷性的性別關係與互動模式，這類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也較難改變。



貳、中上階級

一、工作性質

相較於勞工階級，中上階級的工作者由於工作性質的不同，其工作環境較不強調例行化、可預測性的活動，而是強調責任感與自我導向（Kohn, 1963）。再者，白領階級是一群充滿著信任感與責任心的管理階級人士，這些工作人員抱持著「理性」、「情感中立」，以及「嚴格控制」這樣的信念；對於他們來說，能夠掌控工作是最基本的工作哲學。正因為中上階級背景的父母在工作場域中的工作模式，強調的是個人的獨立性、自主性，重視自我決定與內在規範，因而對應到其教養觀念上也是較為彈性與開放的。此外，在工作上，由於勞工階級可能因為處在一個層級的底端，而比較沒有發言的機會；但是中上階級因為教育程度與職業聲望之故，通常能得到良好的待遇，會受到諮詢以及有機會參與到民主的決策過程，這些作法都很可能會被帶進家庭中，而影響不同階級人們與家人間的互動方式（陸洛譯，1997）。

長久以來，社會上一直把工作與男子氣概的連結視為理所當然，也就是說，現代社會定義、評價一個男性的標準是來自於有給職工作的參與，即體現出所謂「工作的男性（working man）」如此的形象；藉由工作，能授與並強化男子氣概的特點。從批判的觀點來看勞力的分化，強調的是不同職業間「垂直性（vertical）」的關係。所謂的「垂直性」指的是，勞力分化所造成不同位置間優勢與附屬的關係，當中帶著擁有資源的不平等，與知識、競爭關係的差異性，這與社會階層化以及社會階級密切相關。這樣垂直性的勞力分化建立在學歷水平之上，勞心者往往由於擁有高學歷，因此比較能獲得高的資源回報、較大的影響力與決定權，也擁有較多機會去將個人資源投資於工作之上，並享有較大的地位與特權、擁有較大的自信等等。由於擁有獨斷的知識，並藉由在自己工作領域上能參與計畫、管理，以及控制由勞力工作者所執行的生產過程等等，掌握某種程度的自主權，因此能享有特權與獲得資本上的回饋，並能從事業上獲得較大的發展性與滿足感（Dahlstrom, 1980）。許多研究也顯示出，高社經地位的人之所以會有較高的歸屬滿足的一個明顯理由，便是他們在工作上的權力



較大，且得到較多的尊重所致。因為在工作中職位越高，越能用自己的方式運用自己的時間，並且有較多的自由可以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有相當多的自主性來決定如何工作，這是工作滿足的一個重要來源。而如果是專業人員，如醫生和律師等等，雖無許多下屬，他們卻因自己的專長而享有相當的影響力和責任。相反的，半技術和無技術的工人必須服從工頭的指揮，但工頭卻不見得都有領導技能，有的可能還是權威式的、缺乏酬賞性的，較無技術的工人在工作中幾乎沒有發表意見的空間（陸洛譯，1997：126）。因此，工作對於中上階級的男性來說，不只是一個不得不做為餬口工具的手段，還是一種自我實現的工具，會投注心血在所屬的工作領域上，並從中獲得滿足感與認同感。許多經理和專業人士享有這種有趣又有挑戰的工作，但勞力工人卻不然，許多人工作只是為了錢，為了掙一口飯吃。對於勞工階級來說，「工作（work）」對他們來說可能只是一項「差事（job）」，而非自我實現的「事業（career）」，他們不會從出賣勞力的工作中獲得內在的滿足感與自我實現感。當然，這並不是說中產階級的男性就不會在職場上受到剝削，但由於這一群人的自尊、自信來源與勞工階級的男性大不相同，再加上他們的配偶常常也同時扮演著「職業婦女」的角色，因此他們不管在工作上或其他關係上，似乎都較能展現出平等主義式的關係（Edley & Wetherell, 1996）。

工作既然與男性形象的建構有著相當程度的關連性，那麼即使教育程度、收入所得等等有著相似的處境，然而由於工作屬性的不同，也會讓同屬於一個階級的人們，產生不同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並影響其生活中的各個面向，包含著性別角色觀念的建構與實踐。軍警工作正是這樣一個帶有特殊職場文化色彩的職業，在整個傳統歷史的發展中，塑造出的軍警文化，使得其不論是在處事習慣、生活方式、權力運用，乃至氣質風度等等，都自成一格、別具特色。因此當中所衍生出來的工作特性與價值觀念，也很難與一般工作相提並論，必須另行討論。

軍隊不管是在活動的形式或意識型態上，常被描述為男性主宰組織的縮影，是男性化組織的最佳代表。因為在軍隊裡，不論是訓練形式或是意識型態等等，皆不斷強化做為一個男人、一個軍人對「男子氣概」的自我認知與堅持，



並將軍人天職內化於生活實踐層面（吳慶元，2003）。許多軍事訓練的內容，也都在強調傳統作戰所必須有的男性特質，例如攻擊性、強大力量等等。幾個世紀以來，軍事體制一直被男性所壟斷，而且直到目前為止，一般人都認為軍事組織的行為語言、行動和目標，仍把追求英雄氣概視為其基本價值，長此下來，軍隊自然被視為男性的專屬領域，也因此形塑而成相當濃厚的陽剛文化（沈明室，2003）。正由於軍隊這樣的場域被認為是男性氣概的絕美養成地，並身負凝聚男性認同的重責大任，因此相當容易去鞏固一個二元對立的性別秩序與性別權力關係。強調雄性力量、男子氣概、侵略特質的軍隊，是男性氣概展演的極致場域，構築出一個強烈要求男子氣概的基本立場，且將女性氣質的展現視為是對男性氣概的潛在威脅（裴學儒，2000）。警察職場文化亦復如是，由於警察工作裡有太多屬於「男性」做比較適宜的範圍，再加上警察組織向來以男性警員為主要的組成份子，因此很自然的形成一股男性工作文化的氛圍，讓「警察是男人的世界」從未受到太大的質疑，當一個組織主要由男性組成時，它的文化自然也會由男性來形塑。一般人都認為警察工作是較男性化的工作，警察本身也被視為是深具男性特質的角色，因此，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深植的「男子氣概」，包括男性特質的規範、價值和生活形態瀰漫在整個警察文化中（尤清琳，2004）。因此，身處在這樣特殊的職場文化下，工作性質對個人的性別角色觀將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在軍警人員的養成教育與訓練過程裡，被賦予且深化了傳統男性化的特質、強調男性化的性別角色認同，並加深性別角色的分化與分工。

二、成就感的來源

在工作場域中，勞力工作者所仰賴的是體力與團結形式；而對於非勞力工作者來說，所仰賴的則是腦力與理性的運用。Connell（1995）的文章中，在提及由社會所建構而成的男子氣概就曾說到：工作形式以及勞力與腦力之分，是區辨男性的主要指標之一；而形塑出來的多重男性特質，則是構築在階層化的權力與社會地位差異之上。Connell 認為社會上推崇的是理性、中產階級、以及



異性戀形式的男性特質，認為這是當前西方社會中最具合法性（正統）的代表形式（Connell, 1995）。因此，中上階級男性很容易就能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以及社會的推崇與肯定；大部分中產階級的人將工作視為「生涯」，工作對他們而言十分重要，不但定義了他們的生活，給了他們自我認同。

除此之外，男性對自己的性別認同，事實上也受到經濟力量轉變的影響，隨著新技術的產生、失業危機、女性主義爭取平等的工作權，以及階級與地位分化等等因素的影響（Collinson & Hearn, 1996），男性一直以來視為理所當然的工作權利受到了很大的質疑與挑戰。不論是在學校或是職場，女性的表現已經越來越能與男性並駕齊驅，甚至有迎頭趕上之勢，這也造成男性的負擔與壓力。雖然養家活口在傳統上一一直被視為是男性的工作，然而，相對於中上階級的男性，勞工階級的男性更會認為，擔負起一家的經濟重擔是男性的任務；失業在家被認為是好吃懶做、無用的、消極的，也是缺乏男子氣概的。之所以會有如此的差異，是因為相對於工廠文化，辦公室這個工作場域較少被視為是純男性化的領域（Collinson & Hearn, 1996）。

中上階級的男性之所以較能以「平等」的觀念態度來面對女性在職場上的崛起，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佔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女性經濟的自主事實上是擺脫從屬地位的利器，當我們從女性主義思潮的歷史來看，發生在 19 世紀與 20 世紀前 20 年間的第一波女性主義，即是起源於強調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女人，她們關心中產階級女人的參政權、雇用機會、教育權和婚姻財產權等。無庸置疑地，第一波女性主義思潮與運動的最大受益者即是中產階級婦女（Weiner, 1994: 53-54）。在女性能受教育之初，也是以身份背景較為良好的女性獲得優先的受教權，因此，中上階級男性很早就已經適應身邊的女性與其一同求學，甚至在職場上一較高下的情況。而 19 世紀時，因為工業革命的發展產生許多工廠，女人與小孩在工作過程中得到經濟上的自主，也因此進而鬆動了男性在家中的父權地位。對於中上階級的男性來說，雖然在最初，辦公室是純為男性的領域，但是受到任務執掌的擴張與私人服務部門的擴展，許多女性開始得以進入辦公室作一些文書處理的工作；儘管她們薪資較低且重要性也不如男性所擔任的工作，但是總是開始在職場上佔有一席之地。而且由於中產階級的工作通常是人



類理性產生的地方，這樣的理性是侵蝕性別階層化及發展女性主義思想的驅動力，因此中上階級比起勞工階級而言，更易反抗傳統性別關係或萌生女性主義思想（Connell, 1995: 168）。因此，相對於勞工階級，中上階級更能接受新觀念的啓迪；且爲了有更好的生活品質，也能接受越來越多女性共同擔負起家中的經濟重擔。再者，即使面對女性崛起的壓力，中上階級男性的情況仍舊好得多，因爲中上階級的男性在各個領域的表現仍然能與女性平起平坐，且繼續保有支配傳統男性領域之權（Mcdowell, 2003）。因此，中產階級的意識型態比起勞工階級更有性別平等的成分，無怪乎中產階級有很明顯的「機會平等」與「性別平等」的觀念（Deem, 1980: 18）。

然而，即使不同階級的女性皆可以在職場上謀得工作，但在不考慮職業的貴賤、薪水的高低之下，工作對於不同階級的女性所代表的意義與價值仍是不同的。對於勞工階級的女性來說，即便能參與勞動市場，仍被認爲是無足輕重，有時甚至是多餘的，女性的薪水所代表的意義就僅僅只是多了一份收入。然而，對於中上階級的女性來說，由於教育訓練的背景，讓她們的工作相較之下有更多的專業成分的在其中，工作對她們來說不僅僅只是意味著獲得一份薪水，在經濟獨立的背後，更意味著專業能力與視野的開展。國內對於擁有高學歷的女性經驗所做的研究中也顯示，許多受訪者皆坦承在婚姻關係中，掌有經濟大權的一方比較有權威，而倘若雙方都能擁有同樣的經濟能力，則較可以平起平坐。這些高社經背景的女性受訪者也表示：工作對於她們來說是一種提供「成就感」和「自我實踐」的機會，其次才是經濟上的實質意義（蕭淑仁，2003）。因此，女性要擺脫傳統男性掌握主導權的情況、擁有自主能力，主要的決定因素即在於：誰來控制她的經濟？像是女性是否經濟自主，還是只能依靠男性養家；此外，是否有用來交換財產的價值？當女性在經濟上越自主、可交換財產的價值越高時，在婚姻關係中受男性壓迫程度就越小，甚至女性也能擁有選擇伴侶的權力（林義男，1995；吳逸驊，2004）。因此，經濟上的獨立影響了中上階級女性的自我觀念，並展現在性別關係上。



第三節 階級、家庭與性別角色

由於種族、階級和性別三者間的交互作用，使家庭處於一個層級化的社會體系中，而提供了不同層級的成員不同的酬賞與資源（Hughes & Perry-Jenkins, 1996: 175）。在文化理論中，強調階級間的差異主要是來自於個人的家庭社會背景不同，所能提供的文化機會隨之而異所致，並認為教育系統事實上很難消除這種由家庭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不公平。可見因為家庭社會背景的不同，對子女提供的文化機會互異，會隨之影響到子女的人格發展、生活適應和日常行爲（李坤崇、歐慧敏，1993）。由於家庭是兒童個人社會化過程中最初且最主要的環境，因此家庭所處的階級自然會影響兒童的社會化型態。若我們借用 Bourdieu「生存心態（habitus）」的說法，那麼我們可以說，對個人生存心態的形成而言，家庭社會化的過程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家庭裡的生存心態往往是其社會座標所塑造而成，卻也塑造其成員的生存心態，因此兒童往往承襲上一代的觀點來看世界。由家庭所習獲的生存心態，接著構成學校經驗的架構基礎，再經學校加以轉化，乃成爲以後經驗知覺的基模（邱天助，1998：114）。雖然家庭教育只是整個教育系統內的其中一環，然而，父母親的態度及家庭社經條件，卻相當程度地決定了兒童對社會的接觸層面及觀點，影響孩童人格成長、性格形塑、認知發展程序、價值取向等等（翟本瑞，1999）。

個人所屬的階級會影響到他所浸淫的文化，並在各個層面中發酵。Boudor（1974）指出，家庭社經地位是影響個人發展的重要因素，因為家庭的階層處境、維持生計的經濟活動，對家庭關係與互動模式以及小孩子的成長發展一定會有所影響，所以在研究家庭的同時，也不能忽視了父母的工作性質及社經地位會帶給孩子的間接影響（引自黃芳銘，1998：49）。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形式會形成父母的意識型態、共識或行爲，重複地產生或再製其對孩子的關係；所能提供的家庭資本更是會因不同階級的家庭而異，造成孩子不同的成就表現。因此，階級對家庭中的教養價值及態度確有其影響力，這當中當然包括對下一代性別角色觀的影響。



壹、家庭的性別角色社會化

所謂社會化是指個體學習他所屬的社會中人們必須掌握的文化知識、行爲習慣和價值體系的過程。世界上雖然不存在兩個個性上一模一樣的人，但是，同一個社會或同一階層的人往往有著共同的行爲特徵。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主要場所，因爲兒童個性的形成、社會行爲的獲得，最關鍵的幾年是在家庭中渡過的，早期兒童與父母的相互作用對兒童以後個性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社會的信仰、價值觀念等社會化目標都是首先通過父母的過濾，以高度個體化的、有選擇的形式傳遞給兒童。父母本身的個性特徵、社會地位、教育水準、宗教信仰、性別的價值標準等等也都會強烈地影響他們的後代(李丹, 1991: 441-442)。

自幼年時代起，生活經驗就不停地對個人產生社會化的影響，並透過不同的社會化管道，直接地或潛移默化地傳遞性別角色概念給下一代，形塑了男性與女性不同的性別角色期望與規範，讓兩性產生不同的行爲表現模式。成長的過程中，影響兒童性別角色態度發展的因素繁多，然而在種種影響因素之中，父母親對於兒童的性別角色態度發展卻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爲家庭是個人出生的地方，也是接受社會化的第一媒體(林生傳, 1999)，父母親是兒童此時期情感上最爲依賴的對象，我們存在的重要層面均受它持久而有力的影響著，一般做父母的對兒童人格特質發展的影響大於其他人且最爲直接。在許多心理發展理論的主張中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理論都肯認父母親對於兒童性別角色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孩子對父母行爲的模仿與認同上。因此，父母在性別角色的扮演上，對子女有直接的影響(李美枝、鐘秋玉, 1996)；父母親的身教和言教，亦對子女的想法和行爲產生很大的感染力。根據社會心理學的發展理論，在幼兒還無法指稱自己的性別以前(大約是出生後的第二年才會指稱自己的性別)，幼兒已學會把人做男性與女性的分類；而 Bussey & Bandura (1999) 亦認爲，七個月大的幼兒已能區分男女的臉孔和聲音。幼兒這種區別能力的發展，這當中有很大一部分即是來自父母對幼兒的社會化。女性主義者更認爲家庭是一個不平等的場域，兒童在家庭的社會化過程中，內化了男性與女性的行



為態度，並且將這些態度傳遞給他們自己的兒女，因此鞏固了男人支配女人的情況。性別本身雖然以既定的生理構造為基礎，但重點卻在於人們如何看待這些差異；男生和女生如何被社會化取採取所謂男女有別的適當行為，以及被讚賞的是哪些行為（俞智敏、陳光達、陳素梅、張君玫譯，1995）。

有關青少年在家中的性別社會化，先前的研究為數不多。一直要到 70 年代早期，家庭才被視為是提供機構性功能的場域。許多文獻指出：孩子學習到的性別角色行為，大部分來自於雙親的社會化以及楷模（Fox & Hess-Biber, 1984: 56; Otto, 1986），父母親往往會將他們童年的經驗在與孩子互動的過程中展現，最明顯的莫過於是家務工作的分派。個體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會被要求表現出不同的特質，有的被社會化要表現出依賴、脆弱、敏感，不要冒險等等；有的則是被社會化要強壯、自信、獨立。而這些角色期望，事實上是與父母親的角色表現不謀而合的。Bakan（1966）曾言：在家中，父親強調的往往是工具性的行為，而母親則是在孩子社會化的過程中扮演的是表意性的行為。家庭對子女的人格發展和行為的養成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這種學習過程把「個人」和「社會」連結起來，藉由各種社會角色的扮演來達成。因此，性別角色的認同與定型往往與「家庭性別角色」息息相關，「家庭性別角色」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了不同類型的行為模式，使個體表現合乎社會文化對家庭中男性、女性期待的行為，並一再地被操演、強化（林松齡，2002：294）。而受文化影響下的性別角色觀，更可能因此藉由養育行為而不斷地傳遞給下一代，如此持續複製相同類型的性別角色觀。

貳、家庭性別角色社會化的途徑

父母從孩子出生開始，就根據其生理性別與其互動；因此即使孩童的年齡還很小，男孩或女孩已能從他們的穿著打扮和所玩的玩具與遊戲來分辨出男孩和女孩的差異。例如：綁辮子、穿粉紅色裙子、玩芭比娃娃的是女孩；穿褲子、擁有玩具槍、飛機模型的是男孩。在這個過程裡，孩童還會藉由觀察父母及其



他家庭成員的行為，來學習所謂適當的性別角色行為（陳杏枝，2002）。父母對子女的影響經由親子的互動關係最能彰顯出來，無論是對待子女的方式、活動與玩具的選擇、家事雜物的分配、對子女的期望等等，都會在無形中對男孩與女孩產生標籤現象，而影響子女本身的認知。再加上父母的行為本身具有示範的作用，兒童會從其父親與母親行為態度的觀察中，學習到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行為（劉秀娟，1997）。

也就是在這樣一連串的家庭社會化過程中，個體從年幼開始，不斷從衣著打扮、玩耍娛樂、家中成員的身分角色和家庭內部分工模式等等中，注意到男性與女性的差異；漸漸地，會依照此種刻板印象將許多事物（如：職業及家務工作等等）分類成「適合男生」與「適合女生」兩類（林敏宜，1994）。如此藉由不斷的互動過程中，將所接收到有關性別的訊息逐一做出分類。兒童會藉由觀察，學習到被外在環境所接納認可的性別角色行為（劉秀娟，1997）。在外界不斷強化與加深的結果下，個人於是學習到受環境背景影響頗深的性別角色觀，這也就是 Bandura（1977）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當中所提出的概念。此理論主張個體的行為可以透過觀察，進而模仿具體行為，由此理論出發可知，個體的性別角色發展是來自於幼兒模仿成人各種合乎自己性別角色的行為，這是一種透過社會學習所獲得的社會行為。而孩子的性別角色認知通常經由二個方法習得：一為直接的教導或獎懲，在此一階段，性別角色的形成是被動的經由父母有意的分派，包括孩子房間的佈置、衣著以及強化孩子玩適合自己性別的玩具和鼓勵合宜的行為等等，這些都是一種性別課程，子女也因此學會了自己是男孩或女孩的標記，發展出具性別分化的玩具和活動偏好，以及對性別刻板印象的了解。另一則為觀察模仿，這是一種主動的認同和模仿（黃增新，2004；康雅玲，2004；陳志盛，2004；林震雯，1993）。其實兒童的性別分化絕大部分正是經由觀察和模仿同性楷模的行為而學得，因為一方面，兒童模仿與自己同性的父母、手足或師長時常能得到增強；再者，兒童在二歲半至三歲時即進入性別認定期，能知覺到自己與同性楷模的相似性，於是產生模仿。而認同與模仿的對象就是楷模，先由模仿、認同同性別的父母行為開始，然後擴大範圍，由父母到教師、同儕等等。換句話說，社會學習論者認為，個



體性別化行為的學習透過角色仿效的行為，並經由性別增強（reinforcement）及類化（generalization）的過程，使個體表現出符合社會期待之行為。如幼兒觀察父母親的舉止，當父母的言行得到讚賞時，他也會有感同身受的代理性增強感覺，因此會刻意模仿父母的行為；久而久之，個體即學會在類似原來學習發生的情境中表現出被增強之行為，此即類化。而父母亦常常藉著正、負增強物強化塑造小孩子的行為，使他符合某一性別（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編著，1989：389）。

因孩童的性別分類（sex type）最早是在家庭中建立起來的，不僅父母親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生活型態是孩童對性別角色的最初步了解（Baruch & Barnett, 1986），且父母對子女的不同對待也組成他們的性別概念。性別角色的形塑就在父母親不斷的判別、區分中受到極大的影響，父母即是社會化的代理人，家庭性別角色幾乎等於就是社會性別規範的延伸。以下將根據歷來相關研究歸納後的結果，從「雙親的性別角色觀」以及「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模式與性別關係」兩個部分，來探討家庭影響子女性別角色觀的幾個途徑與方式：

一、雙親的性別角色觀

心理學當中許多的性別角色發展理論都曾指出，雙親對子女性別角色所發揮的影響力。例如 Freud 的心理分析論（Psychoanalytic Theory）即強調性別認同中，生物因素與雙親認同的重要性。男女幼童因為以異性雙親為學習楷模，而認同本身的性別並促進性別分化。從父母親認同理論的觀點來看，更認為父母親在兒童性別角色學習中的影響有十足的重要性。兒童經由對父母親的認同歷程中，內化父母的價值觀、態度、行為以及人格特質，進而發展自身的性別角色及概念、態度、價值及行為特質（黃文三，1998）。兒童會看到、聽到每一位父母親和家庭中的成員以及家庭外的人在互動關係中所表現的行為，來學習做一個母親、妻子、父親、丈夫、男人或女人等等，透過每天生活上所接觸的人、事、物的實例當中所學習而來（Rice, 1987）。此外，父母親的性別角色類型亦是兒童學習的實例，如一個父親若表現出來的是較為傳統的父親男性化性



別角色發展的作法，則比起一個平權主義家庭的父親在性別角色發展的作法，兒童也會因而發展出不同的性別角色概念 (Lamke & Filsinger, 1983)。因此，如果在兒童所處的文化當中，不會製造大量的兩性區隔，那麼兒童自然不會發展出刻板的性別基模，也就能避免性別刻板印象的產生。總之，父母會對子女性別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主要是在於：父母本身的性別角色對子女具有示範作用，父母對性別角色的概念或態度會影響兒童的性別角色分化；而父母本身的人格特質會經由示範作用或施予對兒童的教養方式，而影響兒童的性別角色分化，父母對兒童的教養方式不同，對子女也有不同的影響 (Huston, 1998)。許多的研究皆顯示出，家庭中父母親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對男孩或女孩的性別角色發展均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父母是兒童學習性別角色的模範，對雙親（尤其是同性別的父或母）的認同與模仿，是兒童發展性別角色的主要來源 (黃增新，2004)。

(一) 角色態度的示範

父母親所抱持的性別角色觀念，會透過日常生活中想法與態度的表達，甚至是一些具體的行為表現而影響子女。由於態度是屬於內在的心理歷程，除非透過行為來加以表現，否則較難為他人所察覺，更遑論對他人產生影響作用，所以父母親的性別角色態度大多是透過行為的表現，間接的傳遞給下一代 (林翠湄，1989)。因此，雙親男性化、女性化行為的展現或強調，對於孩子來說都是一種無形的影響力。Johnson (1983) 的研究發現，父親的男性化性別角色概念及行為，對女兒增強其女性化行為和對兒子增強其男性化行為，均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如果父親展現讚賞的、攻擊的、獨斷的和獨立的等諸如此類的男性化行為，將更會促使他的兒女成為男人或女人 (引自黃增新，2004)。許素愛 (1990) 的研究也發現：母親的性別角色態度對國中二年級學童的性別角色態度有直接影響，母親的性別角色態度如果較現代化，則國中二年級學童的性別角色態度就比較現代化。在 Firestone 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發現：母親對於女兒的婚姻、事業、母職概念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性，如果母親具備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則透過教養子女的過程中，會傳遞出傳統的性別角色價值觀念，如被動性格、服從等等 (引自何青蓉，1986)。既然父母親是子女性別角色的學習模範，



父母之間的兩性關係也會影響子女的心理與行為發展，因此在離婚或喪偶的單親家庭結構中，由於兒童的性別角色只剩下單一的男性或女性，產生切割示範適當性別角色的情形，因此相較於完整的雙親家庭結構，較有可能對子女的兩性化特質內化產生不利影響（黃文三，1994）。然而，有關父母親婚姻狀況對子女性別角色之影響，歷來的研究並無一致的定論。認為父母親婚姻關係會對子女產生影響的研究大多主張，身處在單親家庭環境的孩子，較容易會有性別角色認同及分化上的困難（吳嫦娥，1989；許美琴，1991；黃月美，1995）。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些研究更進一步地指出，單親家庭子女在性別角色發展上會有趨於「中性化」的現象。這是因為因應單親家庭中的需要，這些父兼母職或母兼父職的角色示範，讓單親子女能學得更多不受傳統性別角色分工限制的自由及獨立（黃裴莉，1993；謝美娥，1997）。雖然結果尚須更多的檢証，然而在此卻也可以看出，無論是在單親或雙親家庭之中，父母親性別角色示範的影響力。

許多研究皆顯示出，不論處在哪一種社經背景中，都能發現父母和子女在性別角色態度上的相似性。學者研究中下社經背景的青少年與母親在性別態度上的相關，發現兩代之間並無差異存在；如果母親認為女性應該同時扮演家庭及職業角色時，其子女的態度亦傾向此種認知（Simmons & Turner, 1976; Meyer, 1980）。而 Perloff（1977）研究中上社經背景的國小學童與其父母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結果亦發現，父母的性別角色知覺若較刻板，其子女的性別角色知覺也較刻板。

勞工階級母親受到階級文化的影響，重視家族關係與家庭的凝聚力，「以家為天」、「以夫為天」的觀念較重；認為女性應該附屬於男人之下，發展出以婚姻和家庭為人生目標導向的價值觀。而勞工階級父親強調男子氣概的展現，容易施展肢體暴力，或表現出輕視女性等行為，也強化了子女性別化的態度。相較之下，中上階級崇尚自主而非順從，對於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不若勞工階級來得嚴格，男子氣概與女性特質的分界也不如勞工階級來得明顯（Anyon, 1982）。而在陳曉慧（1999）以「父親角色」所做的研究中也發現，整體而言，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國小學童父親，性別角色態度上有顯著差異。由於低家庭



社經地位的父親在「追求地位」及「追求剛強」等男性化特質的得分上均顯著高於中、高家庭社經地位者，因為這樣的特質所致，使得他們的子女有較深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再者，中上階級家庭的母親往往因為學歷較高且投入就業市場當中，母親所提供給孩子的是「工具性角色」模範，再加上父母對此角色的態度，使得孩子在耳濡目染之下，能有較開放的思想與平權的態度（蕭淑仁，2003）。從李然堯（1983）的研究中就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者，性別角色發展較成熟彈性，性別刻板印象分數較低。這是因為中高社經地位的家庭所從事的職業是較分不出性別差異性的，主要以技術能力、專業性，而非以性別做重要決定考量。因此，相較於低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而言，中高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較能鼓勵子女有性別彈性的選擇，其子女的性別角色刻板化現象也較少。因此，中上階級的雙親平常所呈現出來的角色態度比較彈性與開明，這也會對他們的下一代有所影響。

此外，勞工階級因為恪守「男主外、女主內」，或是「女人要隸屬於婚姻家庭，男人則負責養家活口」這樣的性別角色觀念，所以大多是男性承擔養家活口的重責大任，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則是料理家務，當個賢妻良母。根據 Komarovsky（1962）、Rubin（1976）和 Lemasters（1975）針對社會階級與婚姻關係所做的相關研究顯示：勞動階級的婚姻關係較強調各司其職、分工合作；但是這樣的分工模式是建立在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模式之上，亦即：妻子負責家務工作，而丈夫則擔任資源提供者的角色（引自 Hughes & Perry-Jenkins, 1996）。勞工階級的男性對於自己的妻子外出工作往往不表贊同，甚至會覺得臉上無光，認為是因為自己無法滿足家中所需開銷所致。因此，即使勞工階級女性必須外出工作，往往也承受許多的壓力與負擔。因為在勞工階級的觀念裡，父親身為一家之主，必需負擔沈重的家計，故他們允許男性在一天辛苦工作之餘，在外面鬼混、到 pub 去玩，調劑身心。但是他們對身為一個「母親」的標準卻是相當嚴苛，女性的責任就是好好持家，因此粗心大意的母親往往受到大家的撻伐，即便是女性本身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如此（McRobbie, 2000）。Ribbens（1994）和 Stacey（1991）的研究就指出，雖然勞工階級的婦女很有出外工作的意願，但是她們卻要承受著罪惡感與焦慮感，因為她們必須面臨無法全心全



意擔任傳統母職角色的壓力與掙扎。這些婦女，相對於中產階級的婦女，很少將照顧與養育子女的責任交給丈夫，因此，勞工階級的配偶很少像中產階級的婦女一樣，去要求另一半對子女有更多的付出。對於這些婦女來說，如果她們必須外出工作，那必定是出自於經濟上的考量。因為她們仍然帶著傳統的觀念，接受父權體制的權威，故離家外出工作是迫於無奈，她們為了家庭可以無私無限的奉獻。

從小受到這樣依據性別角色分工明確的價值觀影響下，也反映在勞工階級學生認為的理想分工狀態。Anyon (1983) 研究勞工階級小學五年級的女生，發現她們對於未來的期望和志向就是婚姻和家庭，並不認為應該擁有自己的事業，只要當一個母親就夠了。而勞工階級五年級的男生也多半「反對」他們的妻子出外工作 (Anyon, 1983: 19-20)。在對學生的訪談中，幾乎將近九成的勞動階級女性都希望長大後能外出工作，但是對勞動階級的男性來說，則有多達六成的男性不希望未來自己的妻子外出工作，另一些 (約四成) 即使同意，但多半也是出自於經濟上的考量，而不得不同意 (Anyon, 1983: 36)。相較於此，對於中上階級的家庭來說，夫妻雙方同時擁有工作是相當習以為常的事，許多女性身兼職業婦女與為人妻母的角色，仍然力求平衡。由於中上階級的夫妻，雙方絕大部分都受過大專教育，觀念比較開放、彈性，因此中上階級的父親願意參與較多的家庭生活，在子女的教養上也願意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所以影響所及，下一代的觀念也會較為彈性多元 (林義男, 1995: 213)。在上述 Anyon (1983) 所進行的研究中，他同時也對中上階級學生做相同的訪談，結果發現，上層階級的女性幾乎全部都表達出想要工作的強烈慾望，也認為這是必要、理所當然的事。在男性的部分，也有高達八成的中上階級男性表達願意讓妻子自由發揮的開放態度，有些男性甚至在陳述中表達了一些有關男性沙文主義與性別平權修正的看法與反省。

(二) 對子女的管教與要求

成人所鼓勵的行為以及管教子女的態度上，也會隨著社會階級的不同而



異。社會學家 Kohn (1977) 就發現，勞工階級的父母比較重視服從、整齊、清潔和尊敬。他們希望子女順從傳統的行為標準，並且聽令行事；他們注重子女行動的立即後果，也常以體罰來管教子女，強調的是服從與紀律，而非自主性與自我決定。相形之下，中上階級的父母較為關切子女的動機和意圖，而不是行動本身。通常，他們會跟子女討論並讓子女曉得為什麼他們應該或不應該如此。中上階級的父母比較重視好奇、快樂和自制，尤其是自制，他們希望子女能夠自律，因此較為傾向自主、自我決定導向；在行動與行為上依據的也是內在的規則與規範，他們時常用心理懲罰一如收回他們的關愛和情感支持，作為控制的手段。這些不同的養育方式事實上與父母的職業有直接關連，尤其是工作經驗的三個方面：包括所受監督的嚴密程度、工作的例行性，以及工作的複雜性。因為大多數的「白領」工作，需要的是自動自發、獨立自主、與人相處和諧，和思想靈敏。反之，「藍領」工作，則通常是執行管理者的指示。在藍領世界裡，工作場域中強調的就是對於規則、規範、教條等的順從，成功取決於是否遵照規定和命令。因此，可以想見勞工階級的父母會訓練孩子接受命令；而中產階級的父母則訓練子女適合他們所知的中產階級生活。社會學家 Lemasters (1975) 也發現，藍領階級的父母在管教子女的方式上不同於白領階級的父母。勞工階級的父親教導兒子立身處事的準則是：男人要有保護自己的力量和膽識、在女人面前要表現剛毅、在人生的大賭局中要有精明的勝算，及在面對橫逆時，要能堅忍不拔地衝破困境。這些父親認為，養育工作是在把兒子訓練成足以擔當某一種職業角色；而藍領階級的母親則認為，她們是在訓練兒子，使他能夠擔當家庭中丈夫和父親的角色(林義男, 1995; Kohn, 1977; Gerris, Dekovic & Janssens, 1997: 834)。

一般來說，父母親通常以溫柔、小巧、嬌弱、五官較為精緻等等來描述女兒，並以強壯、好動來形容兒子，而且父親比母親更是如此，只要聽說是女孩就被認為是漂亮、柔弱，而男孩則被認為是安定、強壯、機警 (Rubin, Provenzano and Luria, 1974)。父母親的態度不但表達出自己的性別角色觀，也在無形當中塑造出兒童對自己性別角色的看待。Fagot (1978) 認為家長希望兒子的行為應該是要粗魯且堅強或是較男性化的，而鼓勵女生整潔、有秩序或是女性化的。



Loy 和 Norland (1981) 也發現家長常會鼓勵女兒表現出情感性的特質，兒子則是主動與支配的特質。雖然這看似是所有身為父母親的共同偏好，但是相較之下，勞工階級的父母親會更傾向於要求自己的子女符合傳統的性別角色規範與期望。在勞工階級文化中，對於男生與女生有很典型的定義，男生與女生在行為和規範上有明顯的分化，對男子氣概與女性特質的詮釋有兩極化的現象 (Clarricoates, 1980)。而且即使和中上階級的學生相比，勞工階級的學生由於受到家庭的影響，在身體攻擊的活動上面較多，但是這卻不意味著他們能容許女性的攻擊活動。他們對於女孩子的行為有很多的拘束與規範，希望女孩能有得體、良好的行為表現，並認為她們理應如此。因此，在勞工階級的文化中，即使是相同的活動，對於不同的性別卻會產生不同的解讀，而產生許多刻板印象，也造成依性別二分的行為期待 (Deem, 1980)。勞工階級之所以對於女性形象帶有如此保守、傳統的看法，是因為受到整個成長環境的影響所致。因為在勞工階級的生活經驗中，性別隔離的現象相當明顯，男孩與女孩從小分屬於兩種不同的群體之中，男孩們從小就是到他們「專屬」的男性酒吧、俱樂部中，跟著他們的爸爸、兄弟們參與這種社會性的活動，而女性一般只能待在家中料理家務，或僅在特殊的日子隨同前往。這些活動與規範都鼓勵著性別隔離，也正是透過這樣的過程，讓刻板印象不斷地加強與加深 (Deem, 1980)。如此的隔離現象從小就已開始，透過許多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化機制，不斷地強化。有關男女生的種種規範，直接對應在所屬的性別角色之上，並要求嚴格的遵守。因此，理想女孩的類型，在勞動階級文化裡是要相當女性化的。

在遊戲互動上面，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些性別差異。許多研究發現到，父母提供男孩的玩具種類較多、較屬於創造發明的性質、較鼓勵接近自然物理環境，以及要求操作藉此獲得環境的回饋；而提供女孩的玩具較多是模仿性、接近社會環境的。觀察小學生的遊戲活動發現，父母經常與男孩玩活動性遊戲，與女孩玩社會性遊戲；常把洋娃娃交給女孩，把球交給男孩，自然造就不同的性別認同和行為發展 (林惠雅, 1993)。此外，父母親除了鼓勵男女孩表現適當的性別角色行為，亦懲罰不適當的行為，對男孩的要求則更為嚴厲。當孩子玩的是同性玩具時，父母親就稱讚他們，但玩的是屬於異性的玩具時，就嘲笑、干擾



他們。但是，父母親鼓勵男女孩玩適合其性別的遊戲，但卻有不同的要求。相較之下，對女孩來說較有彈性，可以給女孩洋娃娃和卡車，但是卻禁止男孩玩洋娃娃；對男孩較嚴厲也較多處罰，包括身體上和口語上的禁止，因為父親們普遍認定女孩是柔弱的，不宜體罰；他們對女孩較和順，接受其獨立的行為，也常與女孩一同玩玩具，或是提供玩具給女孩以資鼓勵 (Fagot, 1978)。其實，孩子從小的遊戲類型或遊戲行為，對於性別角色觀念的形塑也有很大的影響。Giuliano, Popp 和 Knight (2000) 就曾經做過一個有趣的研究，研究發現：女孩如果在童年時期玩較男性化的玩具及遊戲，或者童年時較常和主要是男性或混雜性別的團體玩，即一般認為所謂的「野丫頭」，這些人長大之後比較會有開明的性別角色態度，且可能會影響日後生涯的選擇，如成為大學校隊運動員等等。由此可知，童年時期所受到的教養方式及玩的遊戲或活動所偏向的性別屬性，可能會影響未來成就或興趣的發展。勞工階級的父母比較傾向鼓勵孩子表現出與其性別相配合的行為，讚賞孩子從事與其性別相符合的活動，而譴責與其性別相反的活動，甚至直接提供符合孩子性別的玩具或訓練 (Fagot, 1978)。因此，勞工階級的孩子從小耳濡目染之下，其性別定義也較為嚴格僵化。

(三) 對子女的成就期望

Horner 曾提出「害怕成功」(fear of success) 的說法，來解釋性別角色的社會化學習。他認為，女性會害怕成功是經由性別角色的社會化學習而得來的，由於社會傳統上所認定的女性特質，與所謂能幹、領導、獨立、競爭等這些較具成就取向的特質並不一致，甚至有兩相衝突的現象。因此，在女性追求成功的同時，又害怕成功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如：喪失女性魅力、失去婚姻等等，而產生焦慮感。這樣的預期，會讓女性有壓抑自我成就表現的傾向，也影響其追求學歷與事業的動機 (引自莊淑芳、陳彰儀, 1994)。根據研究顯示，若在孩子幼年時期，父母親就以帶著性別差異的角度去看待孩子的學術能力，且這些信念往往受到性別差異的影響甚於客觀地來自孩子真實的表現時，則會影響到學生對自身能力的信念；孩子會結合雙親與教師的評價，而成為對自我的評價。



雙親對於孩子的信念直接影響到孩子的自我覺知，而雙親的刻板印象和孩子的自我覺知也因此而影響到孩子的成就表現（Tiedemann, 2000）。

然而這樣的現象，在中上階級環境中較不易發生。由於資產階級文化的意識型態強調的是個人自我取向，相較於勞工階級的家族取向以及在職場上合作團結的價值，資產階級較強調個人的成功，而其重視競爭的價值觀，也影響了資產階級小孩的性別角色社會化。中上階級的家庭多半希望女兒能上大學、研究所，擁有事業，並充分發揮潛能，因此追求事業的成功也是中產階級家庭對女性期望的一部份。資產階級女生對於教育和生涯都有較高的意願和目標，認為追求上大學的教育是理所當然的，父母也期待她們在進入婚姻與生小孩前，能去讀大學，取得專業或半專業的技能（Henrickson, 1981）。在 Kessler 等人（1985）的研究中指出，上層階級學生的父母從小就開始替小孩規畫未來，母親也較鼓勵女兒「拒絕傳統以夫為貴」的女性角色，因此在上層階級家庭長大的女孩，通常對於學業和未來事業有較明確且較強的成就動機，較不若勞工階級女孩將結婚與生小孩當成是一生的志業，在教育領域和職場上也較容易與男生競爭（Kessler et al., 1985: 40-41）。另一方面，也由於上層階級女孩通常握有較多的社會資源，因此較不容易受家庭主義（Familism）的迷思所欺騙，多數認為婚姻和事業一樣重要，甚至會以事業為重的也大有人在（Henrickson, 1981: 157-159）。另外有一些研究也指出，女性就業的選擇與原生家庭灌輸的價值觀有關聯，也就是說女性過去的生長經驗會影響後來的就業選擇，例如父母親的教育程度、母親工作經驗的有無，其中以母親工作經驗的有無對女性就業產生重要性影響。中上階級的母親通常教育程度較高，擁有職業的也不在少數，因此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示範。

雖然中上階級的女性相對來說對於自己的事業與生涯發展有相當的期望，且不侷限於傳統的性別角色上，但中產階級的女性也會產生階級與性別角色期望上的矛盾與衝突，性別角色社會化讓女性必須隸屬於家庭的需要，而階級角色又認為個人必須讓自己獲致成功。但是因為相較於勞動階級的女性，中產階級的女性較被鼓勵、也較有機會去發展自身在職場上的事業，這顯示出對於中產階級的女性來說，階級角色的價值已勝過性別角色。中產階級的女性相對於



勞工階級的女性，對教育與職業要擁有更大的渴望，中上階級的女孩對自己的教育與事業比起勞工階級的女孩也要有自信（Henrickson, 1981）。正因為階級環境的有利因素促使上層階級女孩較有追求事業的自信與企圖心，因而不受限制於婚姻。這些女性即使不是很聰明，但是仍對未來充滿信心，研究指出來自上層階級家庭的女孩，由於她們的父親可能是董事長或從事專業性質的工作，因此她們認為自己能獲得任何種類的工作，即使覺得自己不是很聰明，最壞的打算仍是選擇半專業性質的工作（Connell, 1977: 153-154）。Tan（1995）針對新加坡五所高中女校學生施測一份生涯態度檢核表發現，會選擇非傳統職業的女學生大多來自高社經地位的家庭，包含高收入、接受高等教育、有較高職業聲望的父母。由於父親是屬於接受高等教育者，擁有高收入與管理階級的職業，加上母親是接受高等教育及在職的婦女；父母親也常常啟發或鼓勵女兒進入非傳統領域的生涯，因此，她們對於接受教育有較高的抱負，並且希望接受大學或者更高的教育；對家庭與生涯也比選擇傳統職業的女學生有更開放的觀點（引自楊淑涵，2002）。

至於勞動階級的女性則是處於雙重弱勢的地位，由於背後沒有強大的階級資源做為支撐，加上教育程度較低，缺乏足夠的知識與技能來靠自己探索這個世界，她們對於自己的每個選擇勢必要更為慎重，所需負擔的責任更大，對於日後工作的選擇也就較為保守一些。她們只能被侷限在家庭與家鄉中度過一生，相較於她們的男性兄長，她們更加受限。在 McRobbie(2000)針對 Birmingham 勞工階級女性所做的研究就顯示出，在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中，父母往往期望女兒能幫忙打理家務，卻僅給予些微的零用錢以資獎賞，而女孩們也都樂於接受這樣的安排而毫無怨言，她們逆來順受，不視這些工作為一種限制與阻礙，只希望能藉此換得一些屬於自己小小的個人空間與時間。在訪談的過程中，這些女孩也都認為「女性就是應該待在家裡」，並處處流露出對於婚姻與家庭生活的渴望與期待；相對於此，她們對於男性的形容就偏向於對工作、成就的重視。即使這些受訪者的母親以及社區中其他年長的女性們，都擁有自己的工作，她們還是以身為女性在私領域中的角色為人所熟悉與認識。因此，對於這些女孩來說，在家庭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是甚於其他的（McRobbie, 2000）。一個女



性若是事業成功，但是家庭生活卻經營的一團糟，將會飽受輿論的批評與指責。普遍來說，這些女孩都相當順從父母親的價值觀。勞工階級的父母對於女孩的教育期望也低，希望她們能盡快出社會工作，或者在在學期間去兼差打工。父母傳遞「嫁個好老公」的投資觀念，以致於勞工階級女生在學校的學業成就動機總是較低。(Henricksen, 1981)。

這些勞工階級女孩之所以如此信守附屬於婚姻與家庭的文化規範，並非全然因智力或學業不佳造成。之所以缺乏追求事業的自信心，主要是因為階級環境的不利。由於她們所處的階級地位與社區環境，讓她們因為這樣的家庭背景而沒有自信，連帶造成在職業選擇上刻板化的趨向，更缺乏追求事業的企圖心 (Connell, 1977: 153)。此外，在 Valentine (1998) 的研究指出，低自尊的男性在面對女性外出工作時，會以「向下比較 (downward comparison)」的方式，對女性採取壓抑的態度，藉以提供、增加自己的自尊。因此，勞工階級女孩就在這種「女人應該附屬於婚姻及家庭」的性別符碼下，加上階級不利因素的催化，認為自己不必擁有什麼大事業，而將希望寄託在「婚姻」與「家庭」之上。不只勞工階級的女性對自己的期望如此，社會上對於勞工階級的女性也一直存有某些特定的期待：要有女性化的行爲、男女間要有很明顯的區別等等。他們認為這些女性的未來不應該包含升大學與就業，她們或許可以兼個職，但是最終是要走入婚姻與家庭。隨著時代的進步，婦女就業的比率越來越高，許多勞工階級的女性也表明希望外出工作或是兼差的渴望。但是一旦這些女性透露出想外出就業的渴望，她們首先所需面對的矛盾與衝突就是對女性特質的挑戰 (例如：順從、附屬於男性、依賴、隸屬於家庭)，她們需面對來自丈夫要求，與自我需求兩股力量拉扯的矛盾 (Anyon, 1983: 27)。

二、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模式與性別關係

(一) 手足之間的互動

個體在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中，除了垂直縱向的親子關係外，尚有水平橫



向的手足關係存在，兄弟姊妹之間互相在性別角色的發展上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手足與個體彼此相互教導、觀摩、模仿、學習，也彼此競爭、衝突、合作與支配；手足之間所創造出來的環境，不僅影響著彼此的關係，更會影響每個人的性別角色行爲（林翠湄，1995）。過往至今的研究顯示出一共同的趨勢，一般而言，在有年長的哥哥家庭中長大的女孩，會比有年長的姊姊家庭中長大的女孩，表現出較多男性化的行爲；相對的，有姊妹的男孩會比有兄弟的男孩，有較多女性化的特質。因此大體上來說，有相對性別的兄弟姊妹，會比只有同性別的兄弟姊妹較能瞭解異性，性別角色較不刻板（邱方晞，1986；游恆山等，1991；黃文三，1994；黃增新，2004）。而針對獨生子女的研究也發現，獨子較爲女性化，獨女較爲男性化，且性別刻板印象比有兄弟姊妹者強烈（引自王慧鈴，2002）。事實上，手足在兒童性別角色發展上的影響力有兩個層面，包括直接對兒童表現性別行爲的影響，以及透過父母親的影響所產生的間接傳遞；年長的兄姐對性別角色的學習，有著教導與鼓勵的作用（引自黃增新，2004）。即便如此，但有關手足影響性別角色發展的問題上，仍未有十分確切清楚的定論。雖然可以瞭解手足的「量」與「質」和性別角色有所關連，然而階級在此是否扮演著不同的影響力，則尚未有充分的研究。

（二）家務分工狀況

家務分工係指夫妻分攤經濟活動與家事工作的比例。男女兩性因爲生理、心理的差異，導致不同的社會期待與不同的學習經驗，因此夫妻對於經濟角色與家事角色各有不同的偏向，乃是極其自然的事（林松齡，2002）。家務議題過去並未受到重視，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以及女性意識的抬頭，開始讓家務議題受到關注，也逐漸明瞭到從家務工作的分工中，可以看出其與性別角色的關係。其實男性與女性皆可以做許多的工作，但是在很多的社會中，卻都因「性別」來分配責任。很多研究都認爲，社會化過程中所獲得的性別角色態度，是影響家庭中家務工作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機制（方思文，1999）。家中的家務分工可以說是我們社會創造性別的方式之一，一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當中，所獲



得的性別角色態度，是家庭中家務分工是否平權的重要因素。當女性的性別角色態度較為傳統時，會認為家中家務工作是自己的責任；而當其性別角色態度較不傳統時，則會認為家務工作是家中所有成員的責任；相對的，當丈夫的性別角色態度較不傳統時，則其承擔家庭家務工作的機率也會比較大（李宜靜，1990；許巧筠，2003；Presser, 1994）。

Crouter, Manke 和 Mchale（1995）的研究發現，若父母親的家務分工模式較傳統，則青少年在家務工作上有性別角色刻板的現象。林翠湄（1989）對國中小學童的研究也發現，家庭中父母家務分工模式越傳統，則兒童的性別角色態度便越傳統；此外，父親對兒童家務指派的行為越傳統，則男童的性別角色態度越傳統，但對女童則無顯著影響。Cunningham（2001）的研究指出：雙親家事分工狀況與孩子的性別角色態度有顯著差異，且雙親的家務分工模式可以預測孩子的家務工作狀況（引自許巧筠，2003）。因此，父母在家庭中的分工，若清楚地分別扮演著工具性（男性化）角色和情感性（女性化）角色，那麼兒童自小即認識到家務是可以分為女性工作和男性工作兩類。依性別角色發展理論，兒童對雙親，尤其是同性別雙親的認同，是兒童發展性別角色觀的主要來源。在小孩成長的過程中，若母親時常扮演的是犧牲、照顧、養育的照顧者角色時，則女孩很容易就認同了母親，進而認同了照顧者的角色，也複製了母性，因此擔負起母親的工作（呂寶靜，2002）。若父母又常以性別來區隔家務，例如男孩被要求的家務與父親相似，如修東西、倒垃圾、洗車等等；而女孩則是與母親相似的工作，如清理房子、清洗碗盤、照顧弟妹等增進家庭環境安寧的工作時，兩性的工作性質更容易因此而被定型。

不同階級背景下的家庭，其家務分工模式也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勞工家庭中的性別分工情形，就某些方面來說往往比中上家庭更加鮮明。在低社經階層的兒童不管男女都會被分配工作，但男孩往往被賦予的是雜務性的工作；而女孩被賦予的則是家務性的工作，孩子因此從中學習到那個性別「應該」從事什麼典型的工作，而這樣的連結往往會擴展至日後的生涯、職業選擇（劉秀娟、林明寬譯，1996）。李寬芳（1995）針對 900 位台中縣市 40 歲以下婦女為研究對象，發現婦女個人資源對於家務分工有顯著性的影響，亦即教育程度越高、



職業聲望越高，婦女所操持的家務工作越少。而高教育程度的丈夫，由於思想上較自由、平等，也因而會增加自己在家務上的分擔，顯見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型會影響家務工作的參與。事實上，教育水平高的女性對於家務分工會特別講求「公平原則」。研究顯示，夫妻教育程度較高者，能提供丈夫對家務參與的影響力；而妻子的工作所得與教育程度、職業地位等相對資源的累積，也使她能與丈夫重新協商家庭中權力地位關係（李美玲，2000）。至於勞工階級女性，則幾乎把家庭與私領域視為人生的首位，負擔起所有的家務工作，如煮飯、洗衣等等；家務工作被她們視為是成就感的來源，她們可以從中獲得滿滿的自信心。勞工階級家中的男性往往不需負擔家務工作，認為那是「女人家的事」，在對勞工階級女性的訪談中，就有很多透露出家中分工不平等的現象：男性從不需要負擔家務工作，只等著家中的女性成員善後。面對這樣的情形，這些女性即使稍有抱怨，但依然表現出半縱容的態度，因為畢竟家庭這個領域「天生」就是她們的屬地（McRobbie, 2000）。為了為將來的家庭生活作準備，勞工階級的女孩除了廚藝方面的學習外，也需熟悉照顧小孩、養育小孩等等的工作，暑假或是週末，她們都會擔任臨時的保母以累積經驗。

（三）家中兩性地位的比較

在分析兩性地位時，必然會牽涉到「權力」這個重要的概念；「權力」或「地位」概念在性別角色的探究中，常常扮演著決定性的影響角色，而權力的賦予則通常由社會所建構而成。一般來說，通常是較有權力的群體支配較沒有權力的群體，就像是男人支配女人、大人支配小孩。然而，地位高低其實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我們需要藉著具體行為的實踐來加以判定，例如前文所述的家務工作的履行，或是在家中重要決策的參與決定與責任多寡上等等，透過這些比較具體清晰的互動模式分析，再加上觀念的瞭解，將有助於我們瞭解不同階級家庭所呈現的權力關係。

Bernstein 依據家庭社會結構的形式，將家庭角色區分為「地位型家庭（positional family）」與「個人型家庭（personal family）」兩類。「地位型家庭」



的特徵是成員做決定的範圍是基於其在家庭中的正式角色而被賦予的。在這種類型的家庭中，成員的角色劃分清楚，按照年齡、性別及地位等等的不同，各有一定的角色義務，地位與地位間的「疆界維持」程度相當強，是一種封閉式的角色體系，較為傾向採用命令模式和地位訴求，勞工階級家庭即傾向於此類（Bernstein, 1975; 黃嘉雄, 1989）。在勞工階級的婚姻中，丈夫具有傳統上的優勢，丈夫支配妻子、母親支配小孩，整個婚姻以男性家長的需求為中心，並以他的慾望為最優先。勞動階級家庭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父親在家中享有絕對的權威，即使他未必負擔整個家庭的經濟大權；相反地，母親在家中扮演養育性的角色，即使尚須分擔家計，在家中仍無決定權。在這種「階層式」家庭環境長大的情況下，小孩從父親那兒獲得鄙視母親以及男人絕不做家事的訊息，並進一步表現在對未來婚姻生活的概念中（Connell, 1995: 166; Willis, 1977: 45）。生完小孩後，父親的主要角色是管教者，而不是照顧者，大多數勞工階級的男人並不認為夫妻之間要彼此親密共享與溝通。Kessler 等人於 1985 所做的研究中，印證了前述的論證。研究發現：在勞動階級的家庭中，父親即使失業，仍無損於他在家庭中那種至高無上的權威，妻子只能扮演從屬的角色，家中那種男性至上的家庭文化仍無動搖。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成長的孩子，往往不知不覺地將父親的形象吸納進來，而使其男性化角色與父親如出一轍。藉此再製同樣形式的兩性關係，使他與其他異性相處時，重複著家中雙親的關係。藉由不斷強化自己是維繫一個家庭的一家之主，也是家庭的提供者這樣的信念，讓其男性特質得以延續（Kessler et al., 1985: 40）。

而「父權」之所以在勞工階級家庭中如此的至高無上，是因為在勞工階級的職場中，以體力與勇猛為工作能力的指標，強調團結、合作、粗暴、輕視女人的男子氣概表現，在這樣的氛圍下，勞工階級男性在職場上較無法表達內心的苦悶（因為會讓其他勞工階級男性視為軟弱），家庭便成了情緒表達的宣洩口。而勞工階級男性情緒表達的方式就是將職場上粗暴、勇猛、貶抑女性的行為帶入家庭關係中，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勞工階級的男孩亦容易複製父親這種對母親粗暴的行為，而女孩也容易像母親一樣扮演順從與附屬於男性的角色（Henricksen, 1981: 151-155）。勞動階級的男性之所以視家庭生活為一自我表現



的出口，甚至因此造成家庭暴力，是因為階級剝奪造成勞工階級男性薪資較低，有時甚至必須仰賴妻子的薪資才能養活一個家，以致於勞工階級男性無法像中上階級男性那樣，將事業裡獲得的「權力感」，進一步概括到「家庭關係」中所致（Henricksen, 1981）。也就是說，勞工階級男性由於薪資較低，以致於無法完全施展「男人即提供者」的角色，因而更加讓他們想施展「暴力形式」的男子氣概與控制婚姻權力的欲望，使得勞工階級的婚姻比中上階級的婚姻更加顯現出「男人支配」的現象（Pyke, 1996: 3-6）。而勞工階級之所以會發展出女人應該附屬於婚姻與家庭的性別角色觀，Henricksen（1981）認為主要是因為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階級文化，而導致社會化歷程的階級差異。勞工階級女孩受社會化歷程的影響更甚於資產階級的女孩，因為勞工階級文化比資產階級更強調階級內成員的團結與規範遵守；再加上勞工階級重視家族關係與家庭的凝聚力，這些都使得勞工階級女孩會將個人生涯重心完全放在婚姻與家庭，對於個人自尊與成就的追求，即端賴於美滿的婚姻和家庭，因而忽視了去思考她們可能可以從事的事業與理想。因此，相較之下，勞工階級的女性比中上階級的女性更容易受到家庭主義（familism）此種迷思的影響與欺騙（Henricksen, 1981）。

至於中上階級的家庭結構則較屬於「個人式家庭」，此類家庭類型的成員在做決定、修正及判斷的範圍上，主要根據的是個人的心理特質，而非正式地位，即傾向採用個人型的社會化。家庭成員依據其「獲得」而非「被賦予」的角色進行開放式的溝通，地位的疆界程度較低，有較大的角色發展空間。父母親不但社會化了子女，也同時被子女社會化（黃嘉雄，1989；Bernstein, 1975）。其實，在每一種文化中的所有孩童，都需要學習適合該文化的角色與行為。但相對於在許多勞工階層的家庭中，男性角色通常是具有肢體攻擊性的，並且是利用身體力量的展現來解決爭執；在中上階層的家庭中，卻期待男性能表現出語言的與智力的攻擊性並且運用說服的方式來解決紛爭（劉秀娟、林明寬譯，6-7）。中上階級的家庭因為父母親通常擁有穩定、高收入、高聲望地位的工作，所以婚姻關係較為和諧平等（Kessler et al., 1985: 40-41）。他們的婚姻強調一種伴侶關係，重溝通、平等的對待。許多的研究也發現，高教育的夫妻彼此交談較多，較有情感上或知識上的交流，如他們會討論當天的新聞及當天各自遭遇



的事情，他們的自我坦露也較多。高教育的丈夫也被認為較能理解和同理他們的太太，並分擔另一半的責任（陸洛譯，1997）。

由此可知，地位型家庭角色間界線明確而固定，角色間彼此滲透性弱，具有階層性，角色是天賦而非獲取。由於角色分工清楚，角色界線緊繃，因此良好的角色扮演與角色認同內化被視為必要，「是什麼，就要像什麼」。在此情況下，個人的自主意識往往容易被壓抑，而習慣對團體忠誠和盡義務角色。反之，在個人取向家庭裡家庭權威結構較不明顯，成員角色間界線模糊，成員自我意見與情緒能自由表露與討論，易於促成良好互動（黃嘉雄，1989；Bernstein, 1975）。

本章小結

本章首先探討性別角色與階級之間的關係。雖然過往研究大都將焦點擺在父權體制對於女性的壓迫，依此衍生出社會上對於男性女性不同的期望及對待。然而，透過第一節的文獻回顧，我們可以得知不同階級因為階級文化的差異，會產生不同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意識型態。仔細去分析不同階級的青少年文化，會發現無論是在性別角色的觀念上、規範上與互動模式上，都展現出濃濃的階級差異。勞工階級在性別觀念上比較僵化、刻板，且謹守父權社會下所建構出來男尊女卑的刻板形象；而中上階級則展現出較為彈性、開放的態度，男女是「玩伴」而非「玩物」。因此展現在互動模式與性別關係上，可以看出勞工階級男女的互動模式中，帶有濃厚的「性暗示」，男生以貶抑女生來建構自身的男子氣概；女生也只能被動接招，展現出「支配—隸屬」的性別關係。反之，中上階級的女生往往表現出不遜於男生的企圖心與行動力，男女性的相處建立在對等的基礎上，且能彼此欣賞接納。

工業化對人類的影響不只是發生在生產力或生產關係層面上，工業社會本身同時也提出一套方法律則，教導人們如何安排日常生活及規劃生命歷程。因



此，當我們從階級的角度切入，看到青少年男女彼此之間的互動模式展現出如此的風貌後，本研究即試圖從「生產」的角度，去瞭解生產關係對於不同階級所造成的種種影響，並進一步連結到性別的議題上。因此，第二節試著從勞動生產的角度，來觀察社會資源與生活條件的分配，並瞭解對於價值觀念所產生的影響；從中去探討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的狀態，以及分析社會不平等與衝突的問題。職場中的生產型態與生產關係會對階級文化產生作用力，並進而影響不同階級的性別身分認同。勞工階級因為處在勞力市場的底層，因此他們在工廠文化下所建構出來的男子氣概，與中上階級在冷氣房中所建構出來的男子氣概是截然不同的。透過對勞動力的頌揚，並以粗暴形式展現出其男子氣概，勞工階級男性確立了對自身性別的認同。而中上階級不論是在工作性質或是成就感的來源上，皆有與勞工階級不一樣的體會，因而也造就出不同的性別關係。

個體外顯的行為表現在成長的過程中，雖然受到很多社會化因素的影響，然而家庭身為社會化的第一媒體，相當程度地決定了個體對社會的接觸層面及觀點。家庭內部的關係，不但影響外在社會及權力關係的建構，同時也為外在關係所建構。在性別議題上，即使隨著身心的發展，家庭的影響力有了消長，然而家庭在性別角色社會化上所扮演的角色仍不容忽視。因此本章第三節從雙親的性別角色觀、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模式，以及依此建構出來的性別關係三個層面出發，探討家庭對個體性別角色的影響。

第三章的研究設計與實施，即依循上述文獻探討的成果，從三個層面切入以瞭解家庭對青少年性別角色的影響。首先探討不同階級學生的性別角色觀，而後更進一步地瞭解家庭中，父母親的性別角色觀，以及家中性別互動方式與建構出來的性別關係對個體所產生的影響。

